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目录

我们终将重逢.....	4
I. 辞行久远之躯.....	4
II. 千手百眼天下人间.....	4
III. 虚空劫灰往世书.....	4
IV. 罪人舞步旋.....	4
V. 炽烈的还魂诗.....	4
VI. 无神怜爱的雪国.....	5
日月今闻.....	7
南街村——有一种精神叫做理想主义，有一种力量叫做坚持到底.....	7
当代左翼青年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11
苦读马列，深入工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15	
如何看待谷爱凌为例的新一轮造神运动？.....	22
文/知乎@江北烟雨人.....	22
文/知乎@佐伊 23.....	24
日月星辰.....	27
2021 高考零分作文 上海卷·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27
这个照耀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我很怀念他.....	29
日月前事.....	41
列宁的忧虑：革命的理想主义如何抵抗“糖衣炮弹”？.....	41
台湾演义.....	44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为何三年而败？.....	52
日月精华.....	59
贫穷的谎言——因愚而穷？.....	59
消费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新宗教.....	68
日月奇谈.....	85
《让子弹飞》——一部革命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	85
我们要做持久战来扩大理想主义者的队伍——《让子弹飞》观后感.....	92
写着玩的.....	94

我们终将重逢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说再见，所以...我不会把它当做离别

战争已经开始了，是上一场战争的延续

众神为欲望的轮廓镀上七种光辉，以此昭示，它们的权柄可被企及

而现世的基底埋藏着阴燃的残骸，那是对僭越者的警示

高天之上的神座，从来不是为你预留的位置

但僭越之人啊，不要就此驻足，谁都不能隔岸观火，看吧...

Prologue. 捕风的异乡人

序章蒙德，
守护自由城邦千年的巨龙，终于对自由产生了迷茫。被【自由】之神命令的自由，
还能称之为自由吗？

I. 辞行久远之躯

众目睽睽之下，【契约】之神遭人谋杀。在最后的时刻，他将签订终结一切契约的契约

II. 千手百眼天下人间

将军长生不灭，幕府锁国之期亦无尽头。追求【永恒】之神，在世人眼中见到了怎样的永恒

III. 虚空劫灰往世书

智慧是【智慧】之神的敌人，知识是无知之海表面漂浮的诱饵。学城的学者正在催生愚行，而神的智慧对此并无意见

IV. 罪人舞步旋

【正义】之神热爱法庭上的一切闹剧，甚至渴求审判诸神，但她非常明白，唯有【天理】不可与之为敌

V. 炽烈的还魂诗

战争的规则刻写在生物体内，败者成为战火的余烬，而胜者重燃。【战争】之神将这秘密告知旅人，因为她有这样做的理由

VI. 无神怜爱的雪国

她是人再也不会去爱的神，她是再也不会去爱人的神。人跟随她的原因，是相信她终有一日能对【天理】举起叛旗

在无始无终的永恒里，人类将度过安然无梦的一生

但在神明视线的死角下，仍有人想要做梦

VII. 未有之梦

人类有人类的底蕴，我们不是滤清【神选者】后剩余的残渣。从世界之外，我们取得否定世界的力量。

现在，踏入天地之人。你的旅途已经告终，但你仍未越过最后的门扉。若你理解旅途的意义，就上前来。击败我，命令我让路，向我证明你比我更适合拯救她。然后，就去纺织所有的命运吧。

我的记忆已经磨损了太多。但我总还记得，她也喜欢这些花。

“幽灵”终将重来

By: 温迪 and 云堇

私有制还未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仍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还未成果，所以我们不会同国际共运告别。

社会主义革命仍在进行，是上一次共运的延续。

资产阶级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实现留下了看似可能的途径，想以此告诉人民：人人是平等的，社会是公平的，努力能实现理想，谁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主人，所有的权力属于人民。

被资产阶级欺压的劳动群众，被颠倒黑白的理想主义者...这一切一切的社会黑暗现实，那是对欲图打破规则，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的警示。

那权力的席位，从来没有给人民留下过位置

但打破枷锁的人民啊，永远不要停下革命脚步，谁都不能隔岸观火，看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规定的持枪，吸毒，嫖娼，赌博，网诈...的自由，还能称之为

为自由吗？人民终究会对此种暴行产生所谓自由的质疑。

众目睽睽之下，为人民争得自由民主的革命领袖，竟然背后身中数十枪而自杀。在最后的时刻，他将告诉人民：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来，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

资本主义一日不灭，人民解放之时也永远不会到来。拥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小资产阶级，在现实的残酷中，见到了怎样的私有制？

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难以逾越的鸿沟，革命是一切毁灭表面的诱惑。遁入书斋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陷入历史泥潭，而知己知彼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对此并不担心。

修正主义者热爱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闹剧，甚至要求审判一切外敌资本主义势力，但他们非常明白，唯有本国帝国主义不可与之为敌。

革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失败的一方成为历史中的罪人，而胜者赢得一切功名。革命者把这个秘密告诉人民，因为他们有这样做的理由

极端主义分子是人民难以接受的人，极端主义分子是难以融入人民的人。人民支持他们的原因，是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带领人民向现实的黑暗不公举起革命的大旗

在资本主义的异化下，人民将受尽剥削度过失去人性的一生

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死角下，仍然有人要做理想主义的梦

人民有人民的智慧，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异化教育后剩下的社会反叛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我们取得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现在，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你的拨开资本主义云雾的旅途已经告终，但你仍未越过最后的门扉——未能砸碎一切旧思想旧制度旧社会。如果你明白这段旅途的意义，就上前来。超越我，命令我让路，向我证明你比我更适合解放人民。然后，就去构建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还人民抉择命运的权力吧。

我的初心已经忘却了太多。但我总还记得，我也曾经是人民。

日月今闻

南街村——有一种精神叫做理想主义，有一种力量叫做坚持到底

江雨君 · 来源：乌有之乡

第一次听到南街村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部片子中了解到中原的大地上存在着一个神奇的共产主义般的小村子，那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教育人；那里走的是集体主义道路；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没有饥馑，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那里是名副其实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那里依然洋溢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所以才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后的岁月中，我不断地在自己的脑海中想象和勾勒着南街村的形象。她的美好，她的神圣，使我为之心驰神往，魂牵梦绕！她对于我而言，与其说是简单的好奇和向往，不如说是一种无以形容的、挥之不去的强大的吸引、诱惑和召唤！正是因为这难以抗拒的诱惑和召唤，才有了我今年从五月至八月间的三次南街之行，幸运的是其中两次竟然都获得了与王宏彬书记座谈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南街的父老乡亲亲切地称王宏彬书记为“王班长”。在没有得见他的真容之前，我曾经在自己的心头将这个名字默念了无数遍，崇仰了好多年。眼前的王班长朴实谦逊，平和的目光中透露着从容和睿智，条条皱纹和丝丝白发诉说着多年来追寻理想的途中种种难以想象的坎坷和艰辛。

“同学们来到南街村三天了，听了不少，看了不少，也有很多感受，希望同学们今天可以和我面对面地展开一些交流和讨论，通过交流和讨论我们可以对南街村的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刻；通过讨论也可以使同学们对南街村形成共识，使同学们对南街的发展认识得更清楚，我想沟通、讨论、交流是形成共识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你们都是关心南街村继续发展的人，也可以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坐在一起了，就像一家人一样，跟拉家常一样，咱可以探讨一些问题。”

王班长就是以这样一种平易、质朴却又饱含着无限深意的开场白将大家带入了一种既轻松、愉快又不失严肃、紧张的座谈氛围中。通过他对同学们所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耐心详细的解答，我们虽然没有亲见、亲历，但依然可以想象得到他和南街人在近三十年的创业征程中所饱尝的无奈和苦辛；感受得到他们昔日所铸就的今日仍在续写的辉煌和荣耀；当然，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和透视，我们更能够切实地触摸到王班长对南街人过去所坚持走过的、现在依然忠贞不渝地捍卫的集体主义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和执着！

一、“所谓的‘大多数’并不可怕，啥时候都是少数人领着干，多数人跟着干”

当被同学问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多数的南街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像前些年那般坚定时，王班长作出的是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所谓的大多数并不可怕，啥时候都是少数人领着干，领路的人是少数，多数是跟着干。要是多数都是领着干的人，那就到共产主义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历来都是少数人领着干。南街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少数人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领着大家一起干，才让大家感受到了集体的优越性，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是呀，倘若我们总是盲目地迷信“大多数”的态度和意见，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凡事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在当年全国上下包产到户的单干浪潮中，正是南街村的少数几个领导冒着“政治态度不正确”的风险，不是盲目地执行中央路线，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坚持走集体主义和规模经营的道路，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不过，这少数人绝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而是通过“安民告示”这样一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让村民自觉自愿地跟着前行于集体主义的道路上，因为通过强制的手段毕竟只能让群众跟着你走一时，只有群众打心眼里愿意跟着你走才可能将这道路走得长久和永恒！

当然，这少数人要成功地领着多数人干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时时处处都要让群众感受到领头人的先锋模范的力量。“无论你干好事，干坏事，都有群众看着你呢！你自己不走下坡路，就不会有压力。”简单质朴的语言道出的是最深刻最丰富的道理。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那少数的领头人真正具备了牺牲奉献精神，多少年如一日地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傻子精神”，才有可能感召和带动多数人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跟着你去牺牲、去奉献。南街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走到今天，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而南街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渡过 2003 年以来的那场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困境和危机，其原因同样还是源于此。2004 年初，南街账户的流动资金只有 1000 多块钱，这种情况倘若发生在任何一个私企老板的身上，很可能就会出现“人走厂空企业跨”的情形。然而南街人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却没有动摇，他们“要看领路人下一步咋办”，因为企业是集体的，它的兴衰存亡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休戚相关。王班长等领路人终究没有令南街村的父老乡亲们失望，他们积极地想办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带头捐款。正是在领导们的感召下，群众也自觉自愿地拿出自己的存款，共筹集了一百万资金。这笔资金固然是微薄的，固然无法帮助南街村马上摆脱困境迎来新生，但它却最充分有力地彰显了集体的巨大力量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过去南街村凭借着它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南街村仍然依靠着它实现了从困境中顽强的重新崛起，并开始成功地续写和铸就着新的辉煌。

二、“南街村不是真空，社会上有啥这里就有啥”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南街村所坚持的集体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致来自各方面的、饱含着各种不同目的和用心的非议、指责和攻击。他们极力夸张和放大南街村在发展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又极力掩盖甚至是抹煞南街村多年来所取得的骄人的成绩。事实上南街村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纠缠不休的问题呢（比如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比如企业在转型期的发展困境问题，比如外界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对南街村村民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和腐蚀的问题……）？王班长对于那些非议和指责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于同学们心中存在的关于此类问题的困惑，王班长作出的是极其坦率而又坚定的回答。他说，南街村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多年来正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的。南街的路子是一种探索，目前还不完善，还存在着各个方面的很多的问题。但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当地人能不能把存在的问题当作问题去对待。如果能够当作问题去看待，就会不断进取完善；否则就会灭亡。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会有问题，但关键就在于不要把问题看作是影响发展的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人、一个地方前进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通过沟通、交流和讨论，也可以就已有的问题形成共识，并进而对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刻。

谈到外界所指责和攻击的南街村的矛盾和问题，王班长坦率地承认：“南街村不是真空，社会上有啥这里就有啥。”至于大家所提到的问题，“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而是有很多不足之处”。村里居住着包括外地打工人员近万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真正素质高的人并不是很多，由素质不高的人来管理肯定就会有问题和不足。不过，只要能够正确对待，那么存在的问题、不足和毛病就并不可怕，相反还可以成为前进的动力，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腐败问题，它已经不是“苗头”，而是切切实实地发生和存在过的。大家自然都会对这样的问题痛心疾首，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又可以成为反面的教材，事实上有一两个反面教材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各方面的教材。

通过王班长悉心的解答，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南街村的确存在着大小、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分析清楚以后加以关注就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渐克服和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已经严重影响了南街村发展和稳定的问题，更不是因为坚持走了集体主义道路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问题。

至此我们倒是应该反思一下：某些人为何总是对南街村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纠缠不放，甚至不惜蓄意夸大和恶意炒作；而对它已经成功解决的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却从来只字不提甚至还极力否定和抹煞（而这些问题恰恰是除了南街村之外的中国社会目前最紧迫、最严重、最易引发社会动荡和不安的问题）。两相比照之后，他们的险恶用心恐怕是比“司马昭之心”还要昭然若揭吧！如果不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主义道路怀着刻骨的仇恨，为何会将南街村的存在视为洪水猛兽，为何会对它所取得的成就如此不安，为何动辄就要将它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集体主义发展模式必将带来集权专制，必将带来腐败……”云云？倘若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导致腐败，那么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是早就应该将腐败现象彻底杜绝了的，难道不是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南街模式的成功和长期存在，本身就是对某些人所持理论的最有力的颠覆和批判，宣告了他们那套理论的破产，并且使人们意识到原来在主流社会所倡导和实践的发展道路模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成功的模式和范例；倘若人们一朝清醒，真正认识到了南街模式的优越性，并且也要践行南街模式，那岂不是要断了某些人多年来所掌控的剥削之路，发财之源？所以正如有位同学所言：“如果所有的村庄都这样走的话，资本主义还真是没有滋生的土壤，共产主义还真就不远！”

三、“错误的东西有人继承，正确的东西更会有人继承”

在所有关心南街村未来发展的人当中，他们最急于了解的莫过于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南街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出现了王宏彬

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而他又带出了一个好班子，这也是南街村妇孺皆知的道理。既然如此，大家自然就会关心在王班长卸任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位像他一样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这是南街村能否延续今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能否续写新的神话和辉煌的关键。

对于这个问题，王班长认为“错误的东西有人继承，正确的东西更会有人继承”。南街村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有了南街村的今天。尽管主席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但是他的思想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会有人去坚持。南街村有像他王宏彬一样的“一帮子人”信仰毛泽东思想，所以即使在他卸任之后也一定会出现新的一批年轻人信仰并坚持毛泽东思想；加之几十年来南街人从未中断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传播，所以南街的事业也一定会有继承人！

针对有的同学提出的是否可以通过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证今后接班人的“永不变色”，王班长认为制度其实无法保证南街人世代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制度总是在不断地修改完善，后来的执政者总是会修改前任制定的制度，因此靠制度其实保证不了南街红色事业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信仰问题归根到底不能靠强制手段来解决，而只能靠教育引导大家慢慢接受。强制群众跟着你走不可能长久，只有群众自觉自愿地跟着你走，才可能长久。王班长同时指出，南街村总体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个目标在下一代那里会不会变色，目前他还不打包票，因为打包票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使南街村私有制的东西越来越少，直至灭亡，这就必须在操作层面把握一个原则：当私有的成分越来越小的时候，就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近。这个原则在他这里是始终不会变的！王班长并不认同“南街村相当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的说法，他认为南街村只是一个行政村，只是结合自身实际做了一点工作；不过，南街村虽然不是延安，却也可以为那些坚定地信仰、继承、宣传和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一座精神的家园，更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时光倏忽而逝，还没有来得及从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走出来，将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便已经接近了尾声。王班长一再强调自己当年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连字都认不全，写不出。然而就是这位当初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班长，却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理想，带领着南街人谱写了最恢弘、最壮丽、最璀璨的生命的篇章！他不是知名的学者，谈吐间却处处闪耀和激荡着远远胜于学者的别样的博学和睿智；他不是哲学家，却总是能够用最简洁、最质朴的语言，阐释出关于人生价值、理想、信仰问题的最深刻、最丰富的哲理；他不是政治家，却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实践最完美地诠释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情操和胸怀……

通过与王班长的座谈，同学们澄清了很多误区，打消了很多疑虑，坚定了对南街村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更加明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不能不深深地感动并钦佩于王班长带领着南街人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不渝地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践行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那种“孤岛对汪洋”的坚定、执着和勇气！所以不要总是抱怨时代的大环境已经改变，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渐行渐远，而应该首先叩问自己追逐理想主义的信念是否足够坚定；更不要一味地强调外界的环境如何丑陋黑暗，而应该首先审视自己的心灵是否足够美好光明！倘若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能够始终如一地具有王班长那般的坚持到底的力量和勇气，那么共产主义还真的就不是乌托邦！

当代左翼青年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一个利益当头、高度内卷的社会里，能够投身左翼事业的青年，都是认识到现状的不合理，渴望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行动来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是即将燎原的星火。

但没有什么比惨淡的现实更能威胁到我们心中理想的火苗了——主流的裹挟和资本赤裸裸的剥削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个体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面对现实的种种压力，有的同志放下了理想，“回归正常生活”；有的同志看不到成绩，妄自菲薄，受到了挫折打击后陷入了政治性抑郁，甚至轻生自杀。

笔者也曾险些陷入上述的泥淖，万幸的是通过同志们的帮助，逐渐巩固了唯物史观，树立了正确的群众观，拥有了理论自信，让我能够坚持理想并决心为之奋斗下去。

我们要在很不友好的环境中保护好我们的火苗，这样的火苗在当前弥足珍贵；我们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而成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经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充分的民主讨论；而行为上的成熟要求则更高，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千锤百炼。

笔者远谈不上政治成熟，实践经验也不够丰富，在此仅仅是分享本人对雷锋同志四句话的当代解读，与大家共勉。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

我们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和各行各业，不同的成长背景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认知状态。有经验的同志对待没有经验、特别是那些受市场经济毒害深重的同志要亲切耐心，要平等待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统一力量。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只有通过民主集中制才能成为一股坚实的力量；也只有在统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才适用民主集中制（否则就成了官僚集中）。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一定冲突，一个团体可以又有民主、又有集中。

现阶段我们要强调民主，因为在一个不成熟的集体里，大家普遍没有经验，需要更多的民主讨论和相互学习，有经验的同志要有意识地帮助经验少的同志，这是为未来的集中奠定基础——只有政治成熟的同志才能理解纪律和行动的道理，才能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

在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下，人人都会受到主流、非主流的种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像对待敌人一样尖锐批判。很多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用不正确方式去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因此批评时要以帮助和教育的姿态，不能一口气浇灭他们的热情。只有屡次不遵守约定、屡次被指出错误不改正、思想出现严重偏差的人，我们才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

父权制也是世界左翼运动里长久的“毒瘤”传统。当下的中国左翼内部，男同志对待女同志，既存在过分“热情”，使其不堪其扰的不良现象；又存在瞧不起女性，使女性边缘化的错误思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受压迫的女性在左翼的队伍里反而较少。我们要有意识地克服父权制对我们思想的毒害，坚决改正对女性的偏见。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在当下的情况，我们需要有一份本职工作。这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自身连结社会 and 群众的纽带。我们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落实“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的群众工作方法。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我们是愿意和一个吊儿郎当、无所事事的“仇视社会者”交朋友，还是一个积极上进，劳动技能优秀的人交朋友呢？只有将自己融入社会，我们才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并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关注。

正因为我们从事本职工作是为了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如马克思所说，“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至少在群众眼里，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

在做好本工职工作的同时，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老板们为了赚钱，会想方设法地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我们要做事，就一定要腾出时间精力出来，这就会牺牲一些东西，比如加班费、职业前途等，用以寻找志同道合者、共同学习进步、宣传马列思想。这是当代左翼的历史责任，也是锻炼自己、提升经验的方式。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不知大家是否和笔者一样，刚刚接触进步思想的时候，行为举止变得特立独行，希望以一己之力影响这个“麻木”的社会，不考虑方式和时机——这使我丧失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不但没吸引到觉醒的新同志，反倒吸引了不怀好意的关注……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我现在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团结起来的力量才是巨大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就是人的自由；在私有制社会里，产生个人主义的确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左翼青年要勇于奉献，克服个人主义才能够实现崇高的理想。

我们也不能止于在小圈子里抱团取暖，共同进步。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周边的群众。我们不必以小资产阶级的姿态去歌颂劳动者的生活，一线工作往往是枯燥痛苦的，我们要善于发现群众的情绪。另外必须注意，左翼青年个体的投入，很难持久，也不会有太多成效，集体的分工协作才是正道。一句话，团结是我们力量的唯一源泉。

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

在此分享一线工人 A 的故事：

某年某月某日，A 加入了某一线城市一个仅 30 人左右的小厂，签订了为期半年的劳动合同（单份合同，压一个月工资，做不满半年的扣当月工资）和自愿放弃社保声明。人事拒绝了 A 对合同文件的拍照请求，并责令 A 删除了抢拍的几张合同照片。A 住进宿舍后迅速和多名工友交起朋友。

A 很快和带班经理成了好朋友，经理觉得 A 比其他工友有文化，生活习惯比其他工友好，经理跟 A 聊得来，干脆让 A 搬进了他的宿舍。

A 和经理白天一起吃饭，一起蹲街边看路过摩托车，约好一起骑同样型号的摩托车去西藏旅行；晚上下班一起给女朋友打电话，打完了再唠嗑到后半夜……

经理也接触过一些网上的左翼思潮，在闲谈时跟 A 说现在的社会跟毛时代偏差很大，老百姓又被人骑在头顶上翻不了身，对这个社会很是无语。但在工作中，经理却很认真地扮演起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角色，动辄对工友破口大骂，还对一个离职被扣一个月工资，主张维权的工友动起手来，把人赶走后，晚上让大家轮流在厂门口站岗，防止工友回来“闹事”；工友报警后，经理跑过去跟警察协商，让警察警告工友不要“触碰红线”……

A 利用和经理同屋住宿的方便，“偷”到了大家的劳动合同和自愿放弃社保声明。在下一批有毒原料到货的那天中午，A 难以忍受高压和有毒的工作环境，发动其他 4 位名工友向厂方提出离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第 46 条，贵公司未为我们缴纳社保，强令我们在有毒害环境工作威及我们人身安全，我们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赔偿金。

此时经理立马跟 A 打起感情牌，他知道这次“闹事”是 A 带头的，便试图用金钱和感情诱惑 A 来“摆平”这件事。A 没有理睬经理“进屋聊聊”的邀请，坚决和工友们站在一起。经理脸色立马气得铁青，迅速把 A 五人从工作群里踢了出

去。厂子老板接到消息过来了，大声斥喝 A 是来他厂子骗吃喝闹事的，A 的指责毫无证据，并表示厂方几位管理人员都有社保，你们干得好了也可以给交社保，我们从来没说不交社保……干不了直接滚蛋！

于是 A 拿出了偷拍的证据给老板看，老板要抢手机，A 立刻表示我正在和朋友打视频电话，他在那边一直在录像，你抢了也没用。

老板这才悻悻地结清了 A 和另外两名工友的工资（另两位工友收了厂方 400 元的蝇头小利，回去干活了，离职的仅三人，无法影响生产，明显少于厂方管理人员，因此没要到经济赔偿）。结清工资临走时，老板哄骗要和 A 关掉录像“平心静气谈谈”。A 后来对笔者说，“真他妈后悔和那个王八蛋谈，被他骂了一顿，虽然骂回去了，但还是不爽。而且要不是录像偷偷开着，差点被打，下次长记性了，跟这帮王八蛋没什么可唠的，你讲阶级情感，他根本不理解，只会逼逼你为啥没多收他的钱把大伙摆平。”

A 是知识分子，以他的资历可以干到和经理平起平坐，成为老板的走狗，谈笑风生间替老板做事。但他既然选择和工友站在一边，就要与有产者的“道德”和私人“友谊”割袍，克服影响自己判断和行动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不良老板进行勇敢斗争。

我们新时代的左翼青年应该成为这样的人，继承先辈的理想，投身最有意义的壮丽事业当中。

苦读马列，深入工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文/迅行

今年是团一大召开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以进步青年为先锋的五四运动成为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毛主席曾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解放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深情地回忆在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年轻人，他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2]

在当前青年团变成了粉红俱乐部，支部活动变成了吃喝玩乐的荒诞时刻，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重新探讨一下列宁当年提出的命题——青年团的任务。

青年群体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产生于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特指特定年龄阶段的人所组成的、作为生产预备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古代由于 14 岁左右结婚，只有儿童和成年人，没有青年这个年龄层次，清朝末年遍设学堂，地主富农和城市中产家庭子女的脱产学习期大大延长，直接导致了青年群体的产生。这个处于 14 岁到 28 岁的群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精神和社会需要，比如世界观的建立，对社会认知的形成，恋爱和婚姻等等，这是青年团产生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产生于苏联。当时青年团的任务，就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所说，一句话，就是学习共产主义。具体来说，是在斗争中学习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青团的灵魂，当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后，共青团也失去了它的灵魂，变质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对共青团给予了多种政策便利条件，由此发展出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叶利钦时代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发迹于此，在他 24 岁担任伏龙芝地区共青团书记的时候，通过倒卖电脑、牛仔裤和酒精饮料，赚取了高额利润。当时苏联有句流传很广的讽刺性的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资本主义的学校”。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队伍在莫斯科参加五一游行，1924 年。红场五一游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中国带来了青年团。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寻找出路。陈独秀等共产党发起组的同志们热忱地接待他们，安置他们，并委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已经 41 岁的陈独秀为了便于做工作，也加入了青年团，上海团组织为上海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各地也模仿建立本地的青年团组织，山西等地的团组织成立也早于党组织，成为党组织成立的基础。1922 年，在各地团组织成立的基础上，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国性团组织的诞生。



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青年团，就是“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3]也就是说，团在革命年代与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不一样，不仅是群众组织，而且是党的后备军，为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团为党输送了大量人才，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干部学校，学员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彭述之、汪寿华、柯庆施、梁柏台、陈为人等人后来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上左为施存统（书记），右为张太雷，下左为高君宇，中为蔡和森，右为俞秀松。

团是马克思主义与青年运动结合的产物，团的纲领与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团一大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指出青年团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团的具体任务是“一方面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团的工作与党初期的工作也是基本一致的，首先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是深入工农，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工人运动，第三是自身的组织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青年团不是共产主义组织的独创，国民党、基督教也曾有青年团的设置。共青团，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义的青年团，所以，共青团按照列宁的要求，是要学习共产主义，培养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青年人。但客观上，入团标准要低于入党标准，思想要求和组织要求都要低一些，这就使得团员的思想会比较庞杂，有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者。正如蔡和森所说：“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无政府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它猛烈地批判专制统治和剥削压迫，同情劳工大众，鼓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正好切合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特别是反对家庭束缚的心理，受到欢迎。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没有任何一种

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因此，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但他们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究其原因，是这些进步青年持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相结合，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教育他们，在行动上帮助他们，使他们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反映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这无疑契合了他们创立新世界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进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开始，在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帮助下，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来到了法国。正是这一趟法国之行，让他们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社会的黑暗，让陈延年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不仅没有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反而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与吹鼓手。这让陈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这就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恰在此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 104 人被强制驱赶回国，让陈延年、陈乔年看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虚伪与反动。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彻底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1922 年 6 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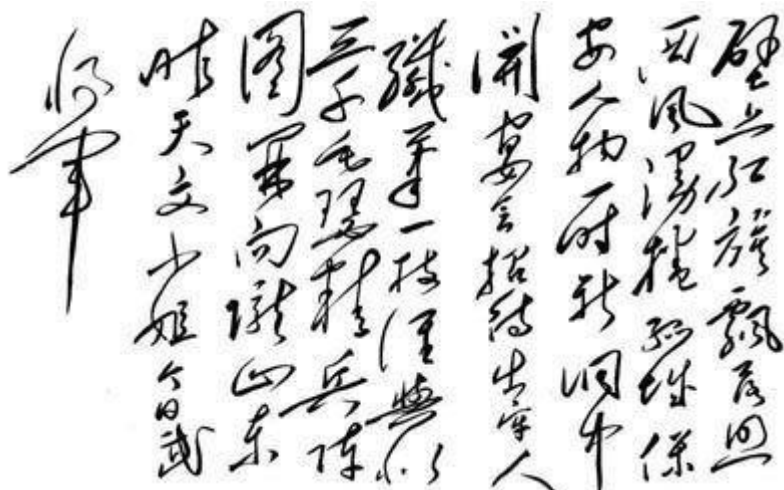
湖南早期劳工运动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时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是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军阀专政没有区

别，他们所领导的劳工会只作经济斗争，不作政治斗争，组织自由散漫。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援助他们，帮助他们用民主集中制改变劳工会自由散漫的状态[4]，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最后终于把他们，连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群众都争取了过来。黄爱和庞人铨在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领导工人与党站在一起，向当时湖南的反动军阀赵恒惕进行了英勇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派残酷地杀害。

黄爱、庞人铨墓

不过信仰的更替不会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容易，当新的信仰确立的时候，曾有的信仰可能还会留有某些残余。更何况，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基本主张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都诉求未来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两种理论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说：“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列宁更为深刻的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根源和世界观基础：“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5]

丁玲就是这种艰难转变的典型代表。丁玲早年也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尤其关注女性的彻底解放，《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一时，但她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方法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徘徊，那时她既不想入党，也不想加入青年团。当她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她受到共产党的照顾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洗礼，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工作帮助她度过丧夫后最痛苦难熬的一段时光，并让她脱胎换骨，走上全新的生命道路。1936年11月，她成为第一个到达陕北延安的左翼文人。丁玲没有放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写作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指出了延安存在的一些坏现象，但丁玲针对党内同志采用杂文笔法，表明她还是没有完全转变小资产阶级立场。最终转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丁玲走进人民中间，采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后一夜难眠。次日派人送信，邀见丁玲、欧阳山，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经过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晚年的丁玲曾说，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能听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



毛泽东赠丁玲同志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青年不仅要树立远大理想，还要改造自身脆弱的性格，摆脱个人小圈子和狭隘的感情世界。尤其是知识青年经受劳动和社会锻炼比较少，性格脆弱，导致很多精神问题的产生。毛主席曾经说：“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6]共产主义者要帮助他（她）们摆脱个人狭隘的感情，走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浙江才女胡杏芬本来是一个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青年女子。她在20岁那年，染上了肺病，并患有神经衰弱症，因此，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外语系，回乡就医。与此同时，她在爱情上也屡遭不幸：她所倾心的男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来又找了一位男友，却经不住封建势力的压迫离她而去。双重打击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936年底辗转住进了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就在胡杏芬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邓颖超（化名李扬逸，人称“李知凡太太”）也来到这里养病。她俩同住一间病房，朝夕相处，很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邓颖超喜欢叫胡杏芬为“亲爱的小猫”，而胡则亲昵地称邓颖超为“我的太太”。这位“李知凡太太”乐观、敏锐、平易近人的性格，对民族命运的热情关怀，对时局的远见卓识，使胡杏芬深受启迪和教育。她把邓颖超看成慈爱而知心的大姐，向邓颖超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和胸中的郁闷，连日记也交给邓颖超看。在此期间，她还有幸结识了化名“李知凡”的周恩来，她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最尊敬的师长，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他看，请求指教。周恩来读了胡杏芬的作品后，非常称赞，认为她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作家。周恩来还深入浅出地给她讲抗战形势，讲民族前途和青年的责任，引导她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最终，胡杏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人。

陈延年、陈乔年、黄爱、庞人铨放弃无政府主义，丁玲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作风，胡杏芬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他（她）们的共同点都在于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在各条战线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咄咄怪事，《那年那兔》的国家主义叙事代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共青团向青年提供的文化产品，把五四青年奖章颁发给与进步性毫不相关的青春女团 SNH48，江西省团委微信公众号上甚至把巴黎公社描述成“流氓暴动”，在最近的白皮书，更是把个人奋斗作为主流价值观加以肯定。

除了宣传共产主义理想，青年团还要为青年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根据团一大的纲领，团组织要“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而近年来，当富士康年轻工人十三连跳的时候，职校生遭受无良学校和企业压榨的时候，学生假期和权利受到随意剥夺的时候，共青团组织都处于缺位、失声的状态。真正的“自由随心飞”[7]只属于少数上层家庭的子女。

总之，共青团，只有摆脱官僚主义习气，摒弃《那年那兔》的国家主义叙事，重新唤起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青年们关心国家大事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同时关心和维护青年人的权益，真正转变成培养共产主义青年的学校，才能真正激活群团组织的活力，否则，只能日益走向反面。

如何看待谷爱凌为例的新一轮造神运动？

文/知乎@江北烟雨人

逮着一个谷爱凌往死里撸，恰好说明中国宣传口对上不对下，对内不对外，甚至连对内都找不到合适的门路，把饭圈的那一套几乎原样搬来了。

我在想，谷爱凌两金一银，在媒体包裹下迅速出圈人人羡慕，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金牌得主、总积分排名世界第一的徐梦桃却几乎无人问津。两者的区别何在呢？也许是谷爱凌的父母是美国社会精英，而徐梦桃的父母在摆地摊、卖烤串吧。

既然如此，羡慕有个屁用？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跟硅谷投资人、高知分子八竿子打不着，却动不动妄自菲薄。我们之中，靠自身努力考上好大学的被蔑称为“小镇做题家”，靠自身奋斗找到工作在城市定居的被嘲笑为“农村凤凰男”，个顶个做着一飞冲天可摘星辰的美梦，对着谷爱凌优渥的生活口水直流，对我们之中卷赢了的幸运儿吐尽口水——再努力也没法跨越阶级。

说白了不就是“恨人有，笑人无”？老祖宗的话照样灵。出身寒门的奥运冠军，全红婵也好，徐梦桃也罢，看客们喊几句“励志”、“奋斗”便一哄而散，面对精英阶级的谷爱凌，立刻不吝赞美之情，满眼放光，歆羡不已，徒增焦虑。

我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一个典型美国梦的西式女子，怎么可能与普通中国人有关呢？出生自由世界，归化社会主义的叙事，掩盖了面对“一等公民”的自卑。反倒是靠努力训练开发天分的寒门冠军，才与我们有关。

谷爱凌家境再好，想拿到冠军不需要刻苦训练吗？需要。没有训练，空手上台，就算谷父是美国总统，是世界首富，也拿不到金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谷爱凌殷实的家境、开明的父母，使得伤病成为她唯一需要承担的风险。她特殊的身份，使得她可以一边享受美国的素质教育再到中国比赛拿奖，一边在中国每年上课两个月成为美国应试学霸。现实是，如此学习强度在中国可能根本考不上高中，而如此参赛在美国根本拿不到26个高端广告代言。

你可以说谷投机骑墙、精致利己，充分利用制度漏洞和资源错配，也可以说她尽忠报国、心怀故土，为国效力论迹不论心。舆论可以宽恕她，也可以批评她，唯独不会无视她。

论努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点不输给谷爱凌，只是家境将努力获得的收益放大无数倍，又把风险降到最低。相较之下，寒门的奥运冠军们，需要付出数十倍的代价，特别是生存和尊严。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人生唯一的高光时刻，但对谷爱凌而言只是丰富岁月的一处注脚，简历上的一行

字。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我们活着就要竭尽全力，即使躺平是个人权利，但至少要对从重围中杀出来的胜利者更加宽容，因为我们都一样，刚卸下前一个重担，又要背上新的行囊。我们可能一生都摸不到滑雪场的门，下辈子也没有来自硅谷的富豪亲戚，但物价、治安、收支、投资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不断留心。一个只在新闻里见到的，脱离群众的人，与我们何干？那些广袤热土上共同呼吸的人，以及那些被铁链牢牢锁住的青春，才与我们有关。

我说过，宏大叙事看多了容易眼乏。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灌输、被强迫而产生的荣誉感，都不能当饭吃。谈到谷爱凌时挺起的胸膛，也不能缴纳水电费。就连谷爱凌都在参赛前提前订好了 C 位代言，把热度变现。论市侩还是资本更现实，我们老百姓就没必要装圣人了。

我只是无法相信，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真的会有一大批人用少数精英的成功捆绑爱国主义，然后堵住普罗大众的嘴只留下掌声。难道老百姓只是精英不凡履历的背景板吗？在精英的闪耀下，为何对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这不得不说是一出让人笑不出来的喜剧。

哪一刻你发现年轻人正在悄悄改变社会？

文/知乎@佐伊 23

2020年4月9日，观察者网发文《“马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称马云为“**人民富豪**”。其后，有人在知乎发起话题，“如何评价观察者网将马云称为「人民富豪」？”这个话题下面有近2000个回答。有一个回答获得了四千多赞，这个回答就一句话，“一个大资本家成功的把自己包装成了和工人阶级一个队伍。”紧随其后的一个回答获得了万赞，这个回答引用金岳霖《形式逻辑》中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为了保持他们的阶级利益，就胡诌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这样的虚假概念……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由真实概念逐渐替代虚假概念，深刻概念逐渐替代初步概念的过程。”

随后，马云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这一演讲，在b站被狂轰乱炸。弹幕区里满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工人爷爷来了”，“996是福报，打倒资本家”之类的话。

5月1日，b站发布视频《后浪》，弹幕区再次沦陷，一堆人甚至跑到何冰微博下面开骂，“能不能别弄那么恶心的视频了行吗，现实点别弄毒鸡汤骗人。老实演戏，没戏演的话歇会，别出来恶心人。”“您还是闷声发大财吧，小孩该送到国外送到国外，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底层的小孩该当服务员的当服务员，您到时候照顾生意就行。”

随后，有人提议设立企业家节。又是一群人跑到他的微博下面满咒骂。有人讽刺，“人大代表？你真的是人大代表？是人大代表，还是资本代表呀？996还不够，割韭菜还不够，还要建立狂欢节？”有人怒斥，“资本家代表人民吗？”有人这样说，“我的话搁这，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我不同意。”

除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例子，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舆论变化。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是算法基于个人喜好推送给我们，因此让我们感觉明显，还是的确出现了某种普遍的趋势？如果的确出现了某种普遍的趋势，那么，造成这种趋势的基础是什么，以及，这种趋势会如何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张表，这张表统计了四个关键词：**资本家**、**无产阶级**、**毛选**、**他**。

这四个关键词中，前两个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用于衡量使用左翼词汇的互联网用户。

第三个关键词是毛选（很多国人是通过阅读《毛选》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用于衡量**自发/自觉**学习理论的人的变化趋势（假定搜索毛选者和阅读毛选者比例恒定）。

第四个是中性词，大致可以衡量使用**百度搜索引擎**的用户规模变化。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资本家	300	338	340	381	514	759
无产阶级	549	594	694	785	960	1134
毛选	254	311	394	415	580	1039
他	3340	2876	2517	2727	3185	2814

佐伊23

百度关键词日均指数

	2016同比	2017同比	2018同比	2019同比	2020同比
资本家	12.67%	0.59%	12.06%	34.91%	47.67%
无产阶级	8.20%	16.84%	13.11%	22.29%	18.13%
毛选	22.44%	26.69%	5.33%	39.76%	79.14%
他	-13.89%	-12.48%	8.34%	16.80%	-11.65%

佐伊23

百度关键词日均指数同比


从表可以看出，2015-2020 年间，使用左翼词汇进行搜索的百度用户**越来越多**。其中，2015-2018 年变化**相对缓慢**，2019 年开始**剧烈增加**，2020 年**增加幅度更大**。在 2015-2020 年间，**搜索毛选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 2015-2018 年变化也**相对缓慢**，2019 年**快速增长**，而 2020 年更是**剧增**。

这表明舆论转向**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系统基于算法推送我们造成的印象偏差，而是的确出现了全网范围普遍的左转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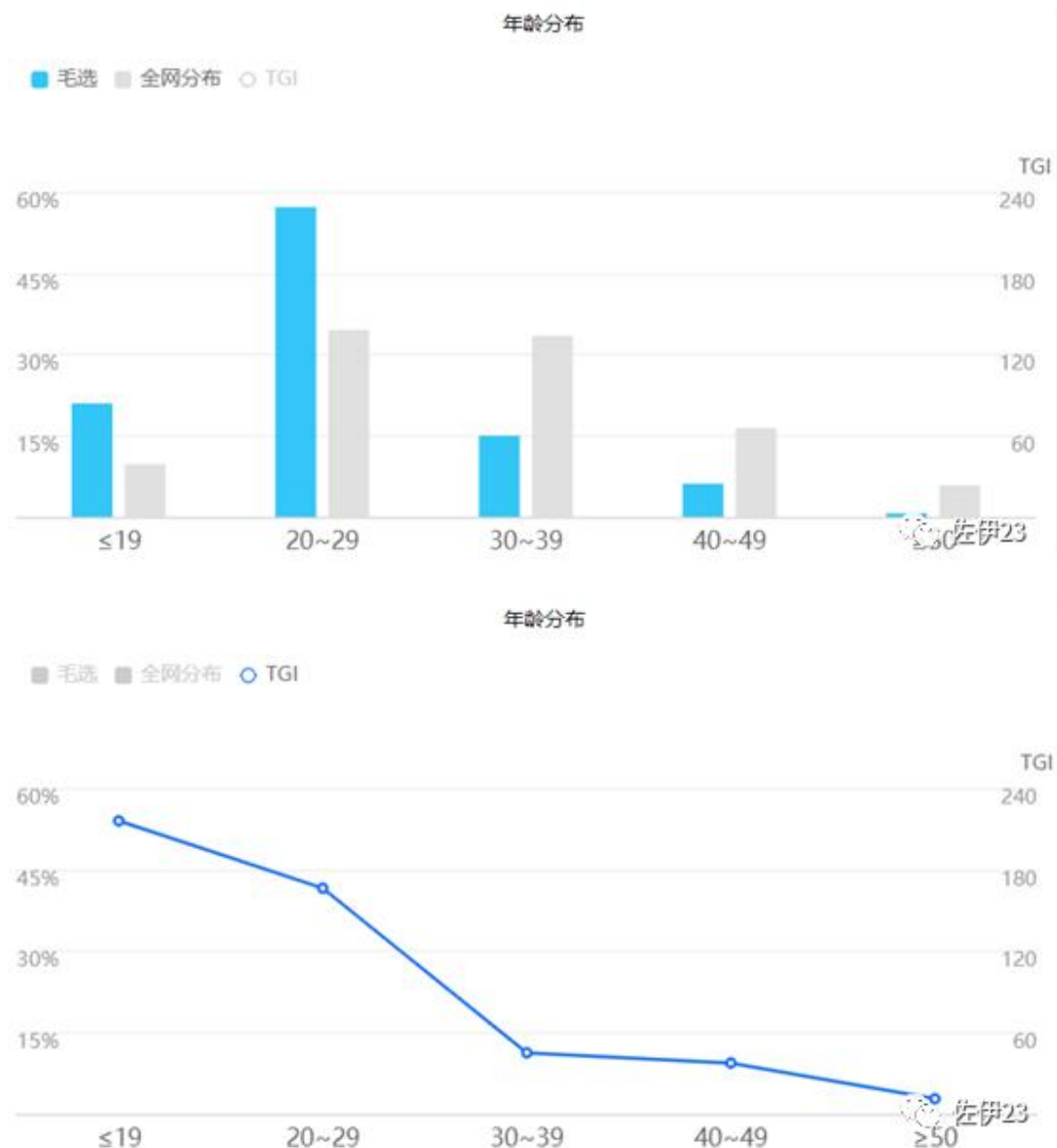
这种趋势在**青年人**中尤为明显。

以 B 站为例，在用户年龄偏低的 B 站上面，出现了为数众多(绝对数而非比例)的初高中生，有些看过《共产党宣言》，有些人看过《国家与革命》，有些人看过《帝国主义论》，有些人甚至在高中就啃过《资本论》。还有一群年轻 UP 主在 B 站(以及知乎、微博、QQ 群)**自发宣称马克思主义**，自发宣称的人数之众，以至于封号完全无济于事。有些人把毛选制作成音频传播，有些人把政经制作成通俗视频传播，有些人放着苏联的歌曲缅怀火红的时代，有些人用阶级的视角解读各种热点事件。还有更多的人，被这种透彻的世界观吸引，用跟风、玩梗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自发反抗。

有些人把 B 站出现的大量跟风玩梗视为年轻人无聊的举动，这是**不对的**。跟风玩梗的本质，是世界观尚不系统的年轻人，被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列主义的)吸引，但却不知道怎么和自身实践联系起来，于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反抗。这种反抗是自发的舆论反抗，因此也是混乱无力的，但是这种反抗却折射出一股

不可阻挡的进步趋势。(：可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

青年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个别现象。百度统计显示，搜索毛选的人以年轻人为主。搜索人群中，29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过 75%。从 TGI 值看([某年龄段搜索毛选人员所占该年龄段比例/所有年龄段搜索毛选人员所占比例]*标准数 100)，19 岁以下的比例是最高的。



资本家的出格之举在网上招来声势浩大的声讨，用阶级、资本家等概念看待社会的人越来越多，搜索毛选的人大幅增长(因此可以判断看《毛选》的人也在大幅增长)，并且以青年人为主，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网上自发从事着宣传，这一切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而非运动)在青年人中回归了。

恩格斯曾为德国工人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理论素养而自豪，列宁也曾描述过俄国工人学习《资本论》时的情景，并称俄国工人继承了德国工人对理论的自觉。无疑，这个趋势在今天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先进无产者(及其后备军)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近年来逐步高涨，这个高涨的趋势在 2020 年进一步加速。

在不知不觉之间，年轻人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

日月星辰

2021 高考零分作文 I

上海卷·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卡斯特罗曾经有一个演说，当时他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被投入监狱，在法庭之上，他为自己辩护说，“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坚定的道路自信跃然纸上。

对事物的盖棺论定总是困难的，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是这样，比如说塑料，给人生活带来的便利更大，还是带来的环境污染危害更大，在它发明数十年后的现在也没法判断。而在历史和社会方面，价值判断就更为复杂，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对事件有着不同的态度，他们发出的声音有大有小、彼此交叠，给事物蒙上了一层莫测的光彩。

一般来说，在历史事件发生当时，最容易发出声音的是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掌控着社会，自然也掌控着社会的宣传机构。其次则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手里握着笔杆子，能在庙堂和江湖发声，把自己心中所想宣扬出去并流传后世。

这样看来，古往今来的改革者们往往声名不佳，这一点也不奇怪。改革者们运气差的落得一声暴戾狡诈、操纵人心的评价，运气好的也会被评价为顽固、不知变通。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改革损害了一些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这里面有推行青苗法的王安石、有推广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也有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他们都为了扩张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把税收到了知识分子和地主豪强头上。他们一心为国求变，反留下了千载骂名。即便到了如今，群众史观已经成了大众主流，这些改革者们也依旧是历史争议人物，因为流传至今的史料也是他们的反对者所写，而他们的功绩则如深埋地下的金子，需挖掘才能闪光。

至于胆敢发动起义，直接物理消灭地主的革命者们，获得的评价就更为不堪了。在地主知识分子们的笔下，他们或化身混世魔王，将一省一地的民众尽数屠戮；或兽性爆发，食人肉，饮人血。他们的历史评价，则更是难以平反。即便是共产党，一开始不也被污蔑成共产共妻的丧失人性之徒么？

那么，卡斯特的自信从何而来，他不害怕自己事业的价值埋没于错误的历史记忆之中么？他有自信，是因为他相信群众。他相信知识和理性终会在群众中传播，社会的话语权也终会突破一小撮人的桎梏，重归大众手中。而群众一定会记得那些为了他们奔走呼号的人。

在东方，也有一位伟人为了社会再无剥削和压迫战斗一生。在他的晚年，为了让社会不再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但是，上山下乡

得罪了知识分子，打烂原有体制的举动得罪了新出现的统治阶层，这其中有不少是他曾经的同志朋友。他的行为被抹黑，被当成他试图强化个人权威的暴行，被当成伟人老糊涂之后的污点，被称为“十分之三的错误”。可是事实真的如此么？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的本心，他的所谓老糊涂的错误，完完全全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他至死都未曾停止战斗。

历史将宣判他们无罪，历史会表彰他们的功勋。

这个照耀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我很怀念他

他却时刻提醒我们，功劳属于全体人民，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无比渺小，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那谁也无法欺负我们。

大家好，我是乌鸦上尉。

今天是 12 月 26 日，毛主席的诞辰，我们就来聊聊“他”——张牧之。



在张牧之来之前，鹅城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富人和地主在城里为所欲为，而人民群众是他们的奴隶，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老百姓只知道当地的黄四郎，不知道有什么县长。

县长敢反抗黄四郎，他们也不敢反抗，因为县长是流水的县长，黄四郎才是铁打的老爷。



有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到了中国，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给他安排沿着铁路旅行，希望他能写一写中国的风景。

然而，斯诺却忠实地记下了，他沿途看到的这个古老国家的落后和苦难：

道路两旁种满了罂粟，陕西军阀们为了赚钱，强迫农民把最肥的地拿出来种鸦片，一旦出现干旱，粮食就不够吃，在西北大饥荒的时候，**几年时间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

西北是各种流行病的重灾区，在上路之前，为了安全，天花、伤寒、霍乱、鼠疫……斯诺把自己能打的预防针通通打了一个遍；

饥民为了换一点吃的，心甘情愿卖儿卖女，让自己能多活几天；他们饿死了以后，尸体还没有下葬就消失了，因为在一些村庄里，人肉是公开售卖的……

1936年四川饥荒的时候，四川靖化县县长于竹君头一次看见吃死尸、吃活人的惨像，从小读四书五经的于竹君被吓得精神失常，**觉得鲁迅写的《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简直是小题大做。**

于是，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写了一篇奇文，说“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四川人筹了141万赈灾的钱，但国民政府贪腐成性，连这点钱也不肯给到灾民头上，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掉了一万多元赈灾的钱。

四川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慈善家尹昌龄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对方屡屡严词回拒。

因为尹昌龄认为，四川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他一直在掏钱救自己身边的百姓，却始终不愿和国民政府合作。

“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

谁能拯救鹅城？这是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在找，却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

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个国家的精英们探索了很多次，却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1

1918年，李大钊介绍了一个学生去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这个当图书管理员的人很不安分，不光在图书馆里读了很多经典，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来图书馆借书，有不少还是他的偶像。

每次他看见了自己的爱豆，都要凑上去想要和爱豆讨论学术问题。

可惜，没有大佬有时间听一个操着福南口音的年青人讲话。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有一次，他去课堂旁听，壮着胆子向讲台上的胡适提问。

结果，得知他不是正式学生时，胡适直接拒绝回答。

这个到处碰壁的小透明，就是毛泽东。

在当时的中国，“胡适”这样所谓要救中国的民国大师比比皆是。

但是靠“胡适”这样的人，是推翻不了黄四郎的，因为他们嘴上说自己是麻匪的命，但实际上却怀着一颗师爷的心。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要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们，守着本本不放，不理睬他。陈独秀就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

觉得农民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

没办法，青年毛泽东只能再次回到湖南。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到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仔细听他们讲话。

他很快就发现，很多汉口、长沙的知识分子说的道理，其实都是瞎想的，真实的农民说出来的和他们完全相反。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但是，他是党内的少数分子，人微言轻，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

1927年，中共五大，他提出“建立农民武装”，但再次遭到强烈反对，还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

除了他，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正是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在全国大肆杀共产党。

秋收起义虽然如期举行，但还是失败了，尔后各大城市的起义也接连失利。连续的失败终于让共产党明白了，在重兵防守的城市，共产党没有一点机会。

唯一的出路，是农村。

前面说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去了红军的根据地，他用自己在红军这里的真实见闻，写了一本《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里，斯诺写道，自己见到了根据地一群年幼的孩子，就问那些还在玩耍的孩子：

“什么是共产党？”

“是帮着红军打白匪和日本的人。”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脱口而出。

“还有呢？”

“他帮着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是资本家？”

“资本家就是不自己干活，而让别人给他干活的人。”

“这里有地主或者资本家吗？”

“没有！”孩子们齐声一起大喊道：“他们都跑了！”

“跑了？干嘛跑了？”

“怕咱们的红军呗！”

一个小孩子，却说红军是“咱们的”军队，斯诺对此感到无比好奇。

斯诺又去问根据地的战士，为什么参加红军？喜欢红军吗？

战士说：“红军教我们读书和写字，教我们操纵无线电和怎么用步枪瞄准，红军是帮助穷人的。”

“红军待我们好，我们一回也没挨过打，这里人人都一样，不像在白区，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人人打仗都是为了帮助穷人，为了救中国。

红军打地主，打白匪，红军打日本，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队伍呢？”

红军每到一地，就会把土地分给穷人，减轻赋税，大规模兴办集体企业。

仅仅是 1933 年，江西一个省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在这里，妓女不再需要当妓女，农民不再需要种鸦片，儿童也不需要去地主家当奴婢。

红军的战士有来自四川的，有来自湖南的，有来自江西的。

这些战士要么是被地主剥削的农民，要么是被师傅虐待的学徒，要么是被国民党害死双亲的孩子。

战士没有衣服穿，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战士没有鞋子，毛泽东就自己也不穿鞋子……

有个福建苏区的年轻战士，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却一点都不把长征当回事，还说“如果红军再长征的话，我就再走两万五千里！”

这是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第一次自己站起来，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队。

正是在红军这里，他们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当做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在红军刚到井冈山上的时候，井冈山上其实有两支农民武装。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他们是当地的绿林好汉，占山为王。

一开始，有人觉得，需要消灭这两个人，他们觉得这就是两个土匪。

然而，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调查过了，这个袁文才是客家人，因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是被世道逼得落草为寇的，占山为王期间也是多次劫富济贫。

于是，毛泽东亲自去见了袁文才，和他聊了聊天，肯定了他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然后告诉他光是占山为王是不够的，革命需要有组织有目标，最后还给他送了 100 多支枪。

袁文才当了多年的山大王，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真正理解他苦衷的，了解他心意的人。

这一谈之后，不费一兵一卒，袁文才就主动欢迎红军来井冈山，愿意接受改编，从此跟着毛泽东。

毛泽东打心眼里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份子，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追随他。

斯诺采访的战士，一说起自己参军之后的故事都会兴高采烈，可以侃侃而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过程。

但是一旦让他们讲述自己参军之前的事情，他们就需要回想好一阵子才能想起来。

用斯诺的话来说就是：

“他们倾向于把这段岁月视为黑暗年代，他们真正的生命，是从成为共产党人开始的！”

这样的一支队伍，在战场上无比坚韧。

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对岸的国民党军早已架好了机枪，第一批冲过去的人一定会被扫射而死，但是红军每一个人都知道，全军的生死都系于铁索桥上，这仗打不下来，自己和战友都要死。

于是，红军战士纷纷主动请战，背着手榴弹和毛瑟枪，攥着铁索一点一点往前挪。

第一个战士被打中，掉到急流中就没有了，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但剩下的人还在不断顺着铁索前进，明知是死，也要夺下铁索桥！

对岸的川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仗的人——这些光着脚，衣衫褴褛，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当兵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而是为了胜利愿意舍生忘死。

打着打着，连对岸的川军都在默默盼望这些红军成功，红军冲过去朝国民党阵地进攻的时候，对岸有的国民党军立马扔下枪就投共了。

官下令拆除剩下的桥板，但已太迟了。更多的红军爬了过来。敌人把煤油浇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就是这样，红军手足并用爬上前来，将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投向敌人的机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高兴地欢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大渡河英雄万岁！”原来敌人正乱哄哄地溃退，红军突击队员冒着扑面的烈焰，全速冲过剩下的桥板，敏捷地跳进敌人碉堡，把敌人弃下的机枪掉转头来对准岸上。

现在更多的红军上了铁索爬过来迅速扑灭了大火，铺上新的木板。不久后，从安顺场过河的那一师红军出现了，他们从侧肋进攻余下的敌人，不一会儿，白军有的溃逃了，有的扔下枪，投奔了红军，加入了追击他们的队伍。一两个小时之后，全军胜利高歌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蒋介石的飞机在红军头顶上空狂怒而无能地吼叫着，红军发疯似地冲它们喊叫挑战。

为了表彰安顺场和泸定桥英雄卓绝的勇敢精神，授予他们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勋章。

斯诺《西行漫记》截图

四渡赤水的时候，红军对国军是3万对40万，国军有飞机侦查，红军在当地没有原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没有依靠。

国军对红军是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却能在国军的眼皮底子下晃点国军，把蒋介石骗得一愣一愣的。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么描写当时的场景：

“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

毛主席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那个无数前辈都没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要拯救鹅城，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黄四郎，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一支由人民群众先锋队组成的军队。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国的执政者一直都解决不了中央权力到不了县、乡一级的问题，而在此之后，中国的十多亿人终于可以团结一心做大事。

在1925年，毛主席写下《沁园春·长沙》时，对于革命的前途还有点迷茫，虽忧心天下，但还是写道：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但仅仅到了 1936 年，他写《沁园春·雪》时，却已然成竹在胸，仿佛天下大势，尽在掌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在张牧之成为领导核心之后，打黄四郎的革命队伍就几乎再没有出过大战略判断上的失误。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他觉得解放战争需要 5 年，但是蒋委员长鬼斧神工的操作把时间缩短到了 3 年。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革命队伍都面临过无数惊涛骇浪。

但你总能从毛泽东的诗句中感觉到，**在一个充满光辉的理想主义者笔下，革命中那种血与火交织的浪漫感，会让一切风花雪月都黯然失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新中国成立之前，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随便一个工业国就可以骑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可以在朝鲜半岛硬刚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把对手一路逼退回三八线！

在前三十年里，印度、苏联、越南、美国都像以前的列强一样试探过中国，但新中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再强大的对手，也无法打断中国发展的脚步。

在革命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牺牲了，毛泽东的家人也不例外。

他的弟弟、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他的侄子，都是英烈，20 多岁、30 多岁就牺牲了。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从小就吃过无数的苦，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的时候，只有 8 岁的毛岸英也一同被抓进监狱。

后来，几经辗转，毛岸英被送到苏联学习。1941 年，苏联和德国开打之后，尽管中苏之间有不让孩子服兵役的规定，但毛岸英还是主动要求参战。

1946 年回到中国之后，毛岸英只跟在他的身边吃了两天饭，就被要求去机关食堂吃大灶。

后来，毛泽东又觉得儿子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和工人一样参加劳动，“**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

毛岸英就按照父亲的要求，去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跟着李克农当过翻译，后来又去基层工厂当工人。

可以说，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一点特权，**反而是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又主动要求，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但不幸的是，**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美军飞机的一次轰炸中，毛岸英牺牲了，成为了 197653 名志愿军烈士中的一个。**

1951 年，彭德怀回北京汇报第二次战役的时候，非常内疚地想要对毛主席道歉。

但是毛主席打断了彭德怀的话：“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儿有这样的道理？”

但其实，在刚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时候，毛主席一度悲痛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彭德怀离开之后，他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庭院里的松柏，无不伤感地念起了南朝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已经非常优秀了，毛岸英还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做得更好。

毛岸英总是在日记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在去朝鲜战场上之前，毛岸英又拿这个问题问了毛泽东一遍，但他只是说：“等你回来，爸爸给你个答复。”

谁成想，这次分别，就是天人永隔。

毛岸英牺牲之后，有无数的人往毛岸英的身上泼脏水，用各种各样编出来的“蛋炒饭”段子抹黑毛岸英，说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是去“镀金”的。

在很多影视作品里，毛岸英这个角色一出现，往往都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跟在父亲身边的木偶，完全不是真实的鲜活的人。

反而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总是被拍成一个风度翩翩又能力超群的公子哥，什么“台湾民主之父”。

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每每战斗在最前线的人，被人说是镀金，要搞世袭。

一个正儿八经子承父业搞世袭的人，却被奉为“民主先锋”。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身为“他”的儿子，就是一种罪过，哪怕把心掏出来把肺掏出来，也是罪过。

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瞒着所有人，把儿子留下的两件棉衣、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叠得整整齐齐，悄悄地收在了一个小箱子里。

这个箱子，他一直带在身边，珍藏了 20 多年，从来没有丢掉过。

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毛主席还会拿出这些东西细细地看，想象着自己的儿子还活着，还在自己身边。

一直到 1990 年，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些东西。

我想，如果能重来一次，毛主席肯定想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好好对毛岸英说上一句他心里想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

“儿子，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3

鹅城和平了，张牧之赶走了黄四郎，也在朝鲜打跑了十八国联军。

但这并不代表革命就此结束，反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开始。

天底下没有人不会犯错，一个队伍壮大了，总会被腐蚀，总会出现有别的心思的人。

打倒了黄四郎，张牧之还想回山里，继续当他的革命者，可是张牧之的手下不干了。

老三老四不想回到山里，他们想去上海，他们想拿着师爷那里来的委任状，去当新的县长。

《让子弹飞》的最后，老三拉着和电影开头汤师爷一样的列车，奔往上海，留下了张牧之一个人。

而穿着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又坐在了列车后面。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前进，黄四郎的身影依然盘踞在革命者身边，阴魂不散。

历朝历代的故事，免不了都要落入同一个宿命：

屠龙的勇士守着如山的财宝，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恶龙，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者来终结自己，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都是如此地循环往复。

革命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被腐蚀了，该怎么办？

1965年，已经阔别井冈山36年的他突然提出：“我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回去看看……”

5月22日，他沿着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真正的革命者，始终要一把枪对着敌人，另一把枪对着自己。

在井冈山上，他挥毫写下了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张牧之又一次背叛了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再一次站到了人民这一边。

那时的他，还是那么豪情万丈，意气风发。

在他眼里，只要自己想做，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做不成的！

哪怕这次的对手，是亘古不变的兴亡铁律。

它看不见、摸不着，它盘亘在人心，比国民党，比斯大林，比美帝，比他面对过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敌人都更强大、更可怕！

但他依然敢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其实，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异类”。

革命的路上危险重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无比的信仰，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坚持走到最后。

一大一共13名代表，其中有4人牺牲，有3人叛变投敌，有2人成为汉奸，有2人脱离革命后又迷途知返。

从那条小船上坚定不移地走到新中国成立的人，只有他和董必武两个人。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

董必武去世的当天，毛主席把一首送别词，反复听了一整天，是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也许是觉得最后“举大白，听金缕”两句太过伤感，他忍不住提起笔，把这两句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

这次也一样，张牧之依然是少数，他要净化被腐蚀的先锋队，老三和老四并不同意。

不止老三老四，当初一起上山的人，有的人已经忘了自己本也是穷苦人的出身，又开始骑到穷苦人身上作威作福。

从革命队伍诞生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

红军时期有个战士叫**肖玉璧**，穷苦人出身，给地主放马的，参加红军以后是有名的战斗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 90 多处伤疤。**

他受伤住院的时候，毛主席曾去医院看望他，当看到这个战斗英雄骨瘦如柴的时候，毛主席眼眶湿润，把自己特批的半斤牛奶全部送给了他。

然而，后来他居功自傲，当税务分局局长时贪污受贿，还把根据地很紧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从中牟利。

事发被捕之后，按红军法院陕甘宁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死刑**。有很多战士给肖玉璧求情，说他是战斗英雄，希望网开一面，但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一定要枪毙他。

有的人没有忘，但“革命者内心潜藏的黄四郎”看不见摸不着，张牧之以往让他们打谁，他们说一不二。

但这次的对手，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即使想打，他也不知道这样虚无缥缈的对手，要从哪里打起。

只有老二，始终站在张牧之的身边。

不少曾经的战友，成为了自己的敌人，他支持的人民群众也不理解他。

在《亮剑》里，1967 年，**李云龙**的部队换了一个新政委，叫**马天生**。

让李云龙觉得奇怪的是，这个马政委 1955 年还是上校，怎么才过了 12 年，就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

结果一出事，李云龙就明白了。

这个马政委最大的本事，就是挑动其他人不要“文斗”，要去“武斗”，不要光写口号写大字报，要拿枪拿炮去“斗”，最好拼个你死我活。

明明本来是要自我净化，有些人却把事情扩大化，拿战友和人民的血换自己的前程。

马天生正是这种人，才会升官升得这么快。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

《亮剑》原著截图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需要引导，没有引导的群众力量失控，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

“革命”可以，但是不能只会“革命”不会“生产”，只会“造反”，不会“建设”。

原先的战友不再和他站在一边，新起来的人有很多也不是真的理解他的本意，只是找到了一条升官很快的大路，只是想做一个“马天生”。

有好人被打成了坏人，有坏人被洗成了好人；有人公报私仇，有人趁机上位；有人只想“文斗”，有人醉心“武斗”……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彻底脱离了他原来的初衷。

他不得不重新拿起了笔，写了很多文件，告诉人民要怎么在“革命”的同时不要忘记生产，不要忘记建设。

但是他老了，他太势单力薄了，那些文件推行不下去，成了一张又一张的废纸。

张牧之举目四望，发现自己无比的孤独。

1975年，他已经垂垂老矣，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多久，一只眼睛刚刚能看东西，他就去看书。

有一天，眼科大夫陪他看书，却发现看着看着，他突然发出一阵呜咽声。

大夫赶忙抬头，他不知为何，捧着古书哭了出来。

大夫赶紧起身去劝：“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

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抱着古书，一时间哭得老泪纵横，肝肠寸断。

大夫靠近去看，他读的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那一刻，岁月塌了下来，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老了，他的时间不够了，他一个人的肩膀再也无法扛起这片天了。

他努力过，战斗过，和数千年的兴亡铁律殊死搏斗过，他真的如同太阳一样，把自己的生命都燃烧殆尽，只想要为天下苍生驱逐黑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顽固的人性面前，他一败涂地。

尾声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他与世长辞。

他诞生的时候，这个国家积贫积弱，人均寿命只有35岁，全国80%的人都是文盲，有钢厂也找不到能胜任的工人。

随便一个帝国主义就可以逼得中国像饥民一样卖儿卖女，最繁华的上海滩，年年都是饿殍遍地，人们的眼前一片黑暗，看不到未来的出路。

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文盲率降低到了20%，有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

大家能吃饱穿暖，能有尊严地活着，再没有国家能够欺负我们，后来的开放和飞速增长都有足够的基础，前途一片光明。

他引以为傲的两件大事之一虽然失败了，却提醒了后来的执政者，要在内部建立有效的自查自省的机制，时时注意自我纠正，防止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腐蚀变质，不要走历朝历代的老路。

很多人年少的时候读不懂他，但时间越久，懂他的人就越多；时间越久，怀念他的人就越多。

没有黄四郎，对鹅城很重要。

在他死后，有无数宵小之辈又换了一身装束，重新粉墨登场，想要再在这个时代再当一次黄四郎。

他活着的时候，这些宵小都被治得服服帖帖，唯有在他死后，这些人才敢出来对他指指点点，阴阳怪气。

但是这些人也知道，他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很高，直接攻击不成，这些人就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旁敲侧击，抹黑他的战友，污蔑他的儿子，这些谣言七拐八拐，最终都会拐到他的身上。

但是，是非曲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反对个人崇拜，老百姓对他喊万岁，他却总是回答说“人民万岁！”

如果没有他，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

但他却时刻提醒我们，功劳属于全体人民，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无比渺小，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那谁也无法欺负我们。

无论身前身后，全世界都有无数他的粉丝，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数不胜数，无论是敌是友，对他的评价都极高。

但他却时时提醒我们，对谁也不要跪，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数万民众不惜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不惜翻山越岭，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去湖南韶山纪念他。
真正一心为民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主席，生日快乐！

日月前事

列宁的忧虑：革命的理想主义如何抵抗“糖衣炮弹”？

本文作者塔里克·阿里将列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这位天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如何以一种比其它历史人物更为深刻的方式来塑造上个世纪的历史。他认为列宁具有极大的远见，即使在生命尽头，依然卧病思考，高昂地批判己方阵营的败绩，并坚持认为一场革命如果不经常地自我更新，便会遭遇失败。

导言

俄国十月革命曾被认为是 20 世纪的中心事件，而今年恰好是俄国革命 100 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西方学者纷纷撰文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和反思。法意则相应地做出了纪念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翻译计划，将不定期挑选个中好文推送给大家，今天是系列的第二篇。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但同时也是 20 世纪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本文作者塔里克·阿里将列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这位天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如何以一种比其它历史人物更为深刻的方式来塑造上个世纪的历史。他认为列宁具有极大的远见，即使在生命尽头，依然卧病思考，高昂地批判己方阵营的败绩，并坚持认为一场革命如果不经常地自我更新，便会遭遇失败。然而，列宁的远见并未被人重视，甚至可以说，俄国已无人能如他那般深谋远虑。

本文作者塔里克·阿里是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英国《新左派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二十余本关于世界历史和政治的著作及七部小说，并著有新作《列宁的困境：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情和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

二月革命后的思考

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列宁对二月革命成功之迅速感到惊讶。当他乘坐德国列车从欧洲的苏黎世到俄罗斯时，他一定是在想，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软弱的自由党派主导了新政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真正令他担心的是，他收到的报告显示，他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摇摆不定。理论将他和大多数左派人士一起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式的。只有在德国、法国，甚至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出现，而不是在当下的俄国。(利昂·托洛茨基和他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人。)

由于革命的进程是预先注定的，社会主义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向临时政府提供支持，因为其通过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并发展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这一切完成，他们就会鼓动进行一场更激进的革命。

这种教条主义和消极态度的结合激怒了列宁。二月动乱迫使他重新思考旧教条。他现在认为，要想继续前进，必须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沙皇国家必须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因此，他在彼得格勒的火车上说：“对一个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或支持这种政府的政党，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列宁的战略与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体现了他的战术思维：“**和平、土地和面包**”。至于革命，他现在认为，国际资本主义链条将会打破其最薄弱的环节。争取俄国工人和农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将为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起义铺平道路。他认为，没有这一点，就很难在俄国建立任何有意义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四月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新方法，但还得努力说服布尔什维克党。当有人指责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时，他就引用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米菲斯托菲尔的话：“理论，我的朋友，是灰色的，但绿色是生命的永恒之树。”对列宁早期的支持者是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她也拒绝妥协，因为她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从2月到10月，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列宁说服了布尔什维克党，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为一场新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拒绝退出战争，他的犹豫不决受到前线部队的布尔什维克鼓动者们的攻击。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暴动和逃亡。

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即苏维埃，列宁的战略开始对大量的工人有意义。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席位，而且该党在其他地方也在迅速发展。

列宁的政治思想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融合产生了十月计划。

十月革命绝不是一场阴谋，更谈不上是一场政变，也许是历史上最公开策划的起义。列宁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最年长的两名同志仍然反对立即革命，并公布了这次活动的日期。虽然它的最终细节显然不是事先宣传的，但接管行动迅速，而且涉及的暴力极少。

在随后的内战中，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场内战中，新生的苏联的敌人得到了沙皇前西方盟友的支持。在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数百万人的伤亡中，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政治和道德代价惨重，其中，最初创造革命的工人阶级几近灭亡。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选择，并不是列宁和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真正的选择取决于红军和白军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后者由沙皇的将军领导，他们毫不讳言如果他们赢了，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人都将被消灭。白军的大屠杀把整个犹太村庄都夷为平地。大多数的俄国犹太人，无论是作为红军的成员还是在自己的党派单位，都进行了反击。红军最初是在内战中由托洛茨基、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弗鲁泽(前两名在斯大林之后被杀害)而形成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几十年之后，是红军在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的史诗战役中，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到那时，列宁已经去世将近20年了。

列宁在 1924 年去世前的最后两年，因中风而衰弱，因而他也得以有时间反思十月革命的成就。他并不快乐。他看到沙皇国家及其做法，非但没有被摧毁，还侵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意识到，俄国大沙文主义猖獗，必须根除。在内战造成的人才损失之后，党的文化水平令人惋惜。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如此可悲，更不要说悲惨，”他在《真理报》上写道。

“最有害的事情是相信我们至少知道一些事情。”

“不，”他总结道，“我们有荒谬的缺陷。”他认为，革命必须承认错误并自我更新，否则就会失败。然而，这个教训在他死后就没有得到重视。他的文章大多被忽视或故意歪曲。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像列宁这样有远见的苏联领导人了。

“他的头脑是一件非凡的利器，”温斯顿·丘吉尔这样写道，后者可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崇拜者。“当它的光芒闪耀时，它揭示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历史、悲剧、愚昧、虚伪，尤其是谬误。”

改革者

在他的继任者中，两位著名的改革者——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和 80 年代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苏联的内爆与其政治文化的退化有很大的关系(有时也与缺乏官僚精英有关)，并且与 1970 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和资源依赖同样有莫大的关系。在执迷于模仿美国技术进步的同时，苏联的领导者们自断了后路。革命最终也是令人遗憾的结局，相当多官僚重新成为百万富翁和寡头——正如托洛茨基在 1936 年被流放时曾预言过的那样。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曾经说过。当资本主义摇摇晃晃的时候，政客们和那些幕后的政治寡头们发现选民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他们的政党。西方政治向右翼的转变是对自苏联解体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联盟的反抗。然而今天，政客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责怪社会主义了——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家保守主义支配之下，今年既没有对二月革命也没有对十月革命开展任何庆祝活动。“它们不在我们的日历上，”他在去年对一位印度记者说。

“在他们死后，”关于革命者，列宁这样写道，“人们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偶像，以使他们成为圣徒，可以说，将他们的名字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受压迫阶级的‘安慰’，来愚弄受压迫阶级。”在他死后，在他的遗孀和姊妹的哭声中，列宁被木乃伊化，公开展示并被当作拜占庭圣人对待。他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台湾演义

文/ 3152626835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搭上了科技革命的顺风车，经济迅速腾飞，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工厂。“台独分子”在此时察觉到了大陆经济的突飞猛进与军队实力的巨大加强，妄图通过“旧”帝国主义国家来撑起台湾自己的一片天。

2020年1月11日周六，我国台湾省举行了“‘皇位’和立法机关选举”，十几年前，我们像追剧一样看台湾选举，但是到了今天，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我如果不说您可能都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这件事。恰逢此刻，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由我来为你讲述1949年以后的台湾政治史。

我国有大量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还有很多台湾同胞就生活在大陆，他们都比我更加专业。所以，本着抛砖引玉的态度，本书将采用“事实+观点”，着眼主线的方式进行讲解。如果同意我的观点，那么就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权当看了一本《台湾演义》。

一、毫无旋律的蒋家之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二战结束。在清朝甲午中日战争后便被割让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蒋介石派遣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但是由于军纪不佳、政治腐败、经济困顿等矛盾，1947年2月28日爆发流血冲突，史称“二二八”冲突。蒋介石随后派遣军队上岛，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行动，死伤万人。淮海战役后，此时的蒋介石意识到了战局的彻底失败，便任命陈诚为东南行政长官、台湾省主席，开始预备所谓的“复兴基地”。而在大陆，蒋介石以币制改革为旗号，借金圆券之手，将大陆中产阶级最后的硬通货搜刮殆尽，夺取了黄金、白银、美钞，合计3亿多美元。这些硬通货后来大部分被运抵台湾，成为蒋介石稳定新台币、在台湾站稳脚跟的基础。

1949年6月24日，蒋介石抵达台北，其前后随即一同前往台湾的大陆军民多达120多万人。如此庞大的移民让台湾当地人口结构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带着外省人来到台湾之后，居住上搞隔离、搞“眷村”；在政治上排挤本省人，空降“戒严政府”；在文化上搞歧视，称“本省人是番薯仔”；加上“二二八”的血仇，造成了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国民党将本省人视为汉奸，颇有八旗入关之观感。

在九十年代之前，国民党政府和所谓的民意机构中都是以外省人为主。考试中对外省籍考生特别优待，仅开放少数名额给人口上占多数的本省籍考生。比例可参考：

1956年的台湾公务员考试，本省人录取率仅为0.061%。

在军队中，国民党防本省人如防共产党。军队到了60年代，台湾出生人数占台军尉官的13.8%，校官的9.6%和将官的1.3%。这还只是个数字游戏，包含了台湾出生的外省籍人，但在当时的台湾，父亲为外省人，在台湾生了儿子其实仍旧是外省人，即“外省人”可世袭。长此以往，外省人培养了高人一等的贵族心态。此等省籍矛盾在岛内称其为“族群矛盾”。

多年来愈演愈烈，**捆绑了一切政治议题**。当时蒋介石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于所谓的“反攻大陆”，但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本省人在蒋介石政权眼中只是炮灰，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可以回到大陆，那也是这些外省人回到南京作威作福，台湾人除了要牺牲外，并未被视为自己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20 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和国家建构、完成了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基础。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战略被宣告彻底失败。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本是“反共先锋”，但在“越南泥潭”背景下不得不低头，经过“乒乓外交”的操作于 1972 年访华，发表《联合公报》承认“一个中国”。同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双管齐下，岛内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代表中国合法统治的根基消失，长期塑造的“反共意识形态”摇摇欲坠。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长期受压迫的本省人意识开始抬头，族群矛盾火药桶一触即发。

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去世。国民党上演了一出“**宫廷继位**”的戏码。6 日，蒋介石御用文人秦孝仪请蒋经国在遗嘱上签字，而蒋经国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中常会一致慰留，并决定由蒋经国处理蒋介石的治丧事宜。28 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将“总裁”等职位保留为蒋介石的专门身份，加设主席一职总揽党务，由蒋经国出任**。蒋介石副手严家淦，接任“皇位”，三年以后正式交出大位。从林森到严家淦，一众党国元老都很摆得清自己的位置。

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面对内忧外困，蒋经国“双手并用”。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团结本省人。蒋经国的治理期间，台湾完成“**十大建设**”。恰逢日本产业升级，台湾接收了大量日本的低端产业转移，建立了初期资本积累，进入“**经济奇迹时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政治方面，蒋经国积极提拔本省人进入权力核心层，实行所谓“**吹台青**”政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本省精英：李登辉、吴敦义、吴伯雄等。以上提及之人皆是于这一时期被推荐进入国民党官僚晋升体系。但是，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政治如何改革，说到底国民党当局都还是“**军事独裁政权**”，甚至始终在执行“**军事戒严令**”。

蒋经国使用多种方法，但都抵不过国际大气候的变换。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塌了，所谓“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早已无人愿提及。但本以为还能够依靠“旧”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撑着一片小王国继续逍遥。但未曾想到，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70 年代，又一批本省精英成长为社会中坚阶层，开始要求政治资源再分配。“反共意识形态”瓦解后，“民主化”、“自主化”、“本土化”等社会思潮迅速占领舆论高地，对国民党构成极大威胁。

当年 8 月，大批本省知识分子创办“美丽岛杂志”。这些知识分子在世界人权日当天，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导致爆发了自“二二八”以后最大的一场警民冲突。杂志社核心人员被逮捕审判，其中以叛乱罪被起诉的有**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吕秀莲、张军宏、姚嘉文和林弘宣**，而代理律师中有**江鹏坚、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史称“**美丽岛大审**”。该审判奠定了此后二十年的台湾政治、尤其是民进党的核心人物的江湖地位。以上所提及之人日后皆为民进党名人，且除林弘宣外皆担任过民进党主席，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亮相。

在此后，台湾陆续又发生若干大案，如“**林宅血案**”。

1980 年，美丽岛杂志编辑林义雄的母亲身亡、他的双胞胎女儿一死一伤，至

今仍是悬案。

再比如“陈文成命案”。

1981年留学美国的陈文成博士返台探亲，结果遭到了“警备总部”的谋杀，而当局还说这是他畏罪自杀。

当然，最轰动海内外的、最敏感的当属“江南命案”。首先做一个铺垫，今天很多海内外媒体将蒋经国作为“民主先锋”，理由是蒋经国不搞“家天下”。但事实上，并不是蒋经国不想，而是因为不能。蒋经国嫡长子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很早便把身体玩废；二儿子蒋孝武也并未好到哪里去，出身显赫使其优越感极强，拒绝学习，成日打架斗殴，学业荒废后被安置进入军校，在军校中亦是“公子”做派，不守军纪，但教官敢怒不敢言，毕业以后被送往国外进修。蒋经国上台以后，蒋孝武先是担任公营企业董事长，后做“中央广播电台主任”，进而进入了党中央。再之后他进入“安全会议”负责情报事务。

江南案为笔名江南的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因为写作《蒋经国传》暴露过多机密而遭当局仇恨。于1984年遭情报机关派出的黑道人士杀害。刺杀美国公民一事令美国当局震怒，逼迫蒋经国清洗情报机关，进而导致蒋孝武失宠。最后于1985年，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爆发毕案，由于金融纪律问题，最终导致信用社结束营业。大量存款户一生积蓄血本无归，十多人受害、六十多家企业破产。民众对国民党当局丧失信任。

1986年美国放弃支持近二十五年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导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此时，身体垮掉的蒋经国被这一系列事件完全压垮了传宗接代以“世袭”政权的想法。所以，综上所述：前些年某些人群将蒋经国奉为“东亚民主先驱”的行为，完全是倒果为因，蒋经国不搞世袭，**非不为，实不能也**。到了晚年，蒋经国之子或死或废，本人身体也半瘫痪。蒋经国看着家天下无法传下，争取混个好名声，所以他**对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势力变得极其宽容**。在这个环境下，1986年民进党成立。在成立之前，民进党的标签就是“党外进步势力”；在成立之时，这群“党外势力”纯粹是“反国民党联盟”，此时还并未开始追求所谓“台独”。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解除执行了38年的“戒严令”，11月2日开放了大陆探亲，最后于1988年1月1日解除了所谓“党禁”与“报禁”，其人也于1月13日去世。

蒋经国的去世在党内外造成了两大变化：一是国民党分裂，二是党外势力崛起。

首先是国民党分裂。蒋经国因为没有明确的接班人，导致党内的外省人精英一致认为：“党国的江山应该属于我们。”但是当时担任台湾副“皇帝”的却是本省精英，李登辉。

李登辉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二战末期被强征参军，还未发配前线便遇日本投降。“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李登辉在台湾大学读农学，事件给他造成了很深的冲击。1950年，李登辉首次前往美国留学；1960年，李登辉再次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70年代蒋经国担任“行政长官”时，李登辉因身为农学专家被引荐给蒋经国，成为蒋经国“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上文早已提及，蒋经国为了缓和族群矛盾，提拔了大量本省人，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便因此走向上坡，并在1984年成为副“皇帝”。

按照台湾所谓“宪法”，李登辉应当继承“皇位”。但是外省精英出于强烈优越感而反对李登辉这个“本省出生的‘太子爷’”，甚至拉着旅居美国的宋美龄一同反对。矛盾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外省精英宋楚瑜亮相，其父是当局高官。宋楚瑜出任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成为党内官僚。在担任文化官僚期间，宋楚瑜接触到大量党外势力，并结合国际形势。他意识到：**国民党的老套威权政治已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虽然在党内他人微言轻，却决定赌命运的枪。当所有人都在为是否支持李登辉而争论不休时，宋楚瑜在“李登辉能否代理党主席”这一问题上慷慨激昂、大胆发言，被外界形容为“临门一脚”，使李登辉代理主席案终能成行。

而反对李登辉的一批国民党官二代在此后成立了“新国民党连线”，导致**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冲突从身份认同发展到了权力斗争、甚至是路线斗争上**，越来越激烈。1993年，这批人退出国民党成立“新党”。

拥立有功的宋楚瑜因此事得到李登辉的重用，时人称“李宋情同父子”。1993年，李登辉委任宋楚瑜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年，韩国瑜当选“立法委员”，他也是2020年1月11日选举的候选人之一，不过在当时，其政治生涯仅逢伊始。1994年李登辉改台湾“皇帝”为民选制，而宋楚瑜成为首任民选台湾“皇帝”。其人不间断在电视媒体前表演所谓亲民形象，使其民调满意度达到90%，一时无两。

李登辉看出了宋楚瑜的庞大野心，故在1996年，先选择连战作为副“皇帝”，再“修‘宪’冻‘帝’”，成功架空台湾“皇帝”宋楚瑜，致使情同父子的“李宋”二人瞬间反目。至1999年，李登辉开除宋楚瑜党籍并抛出“两国论”，正式走上了“台独”的不归路。宋楚瑜凭借超高的民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的“皇位”选举。

其次是第二个矛盾：党外势力崛起。上文已提及，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团结的是所有反对国民党压迫的人士——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劳工、农民等弱势群体。国民党反对什么，民进党便支持什么。比如国民党长期不重视环保、破坏环境，所以**环保与反核始终是民进党的基本议题**。

经过40年的反动执政，1991年，国民党结束自大陆时期就实行的“动员戡乱”政策。此事直接导致台湾内部被压制了40年的火药桶猛然爆发。一时间，黑金黑帮遍布台湾，无头血案时常发生，甚至可以说是见怪不怪。电影《黑金》除去结尾混战充斥浪漫主义情节以外，内容几乎就是台湾当年的真实写照。可想而知，人民极大不满、街头政治风起云涌，民进党借此机会获得社会多数人的支持，对国民党妄图维持的旧秩序造成了直接的巨大冲击。

李登辉掌权后，政治上，积极拥抱美日韩，甘心在冷战时期为帝国主义作帐；经济上，故意限制台湾资本对大陆的投资；文化上，继续推动以意识形态反大陆，培植“台独”思想，为其之后“两国论”铺设理论基础。在此等环境之下，台湾朝野里应外合，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正式通过“台独”《党纲》，将所有的野心都包裹到了人造的族群矛盾之中，建立了“国民党就是外省人，外省人就是大陆人，大陆人就是中国人，反国民党就是反中国人，所以要‘台独’”。此逻辑既无知又无耻，但却十分有效，一举完成了对民进党派系的整合，使一个街头组织正式转型成为政党，开始为日后的执政打下基础。

二、鸡飞狗跳的蓝绿之争

在蒋家的威权统治之后，台湾进入了新世纪。蓝绿之争、统独之争等逐个登上历史舞台，台湾政治纷纷扰扰。

书接上回，李登辉运用手腕，绑架国民党、搞下宋楚瑜。

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美国如日中天。1995年6月7日，美国政府和国会批准李登辉以个人名义访美，李登辉成为首个入境美国的台湾“皇帝”。此等突破使其一举超越“两蒋”，岛内声望大涨，在大陆面前装了几十年的忠臣后，这个内奸就要跳反了。在母校康奈尔，李登辉发表演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论调。多数人都知道“台独”为何意，即使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独台”为何意，所谓“独台”即反动派操作的一种理念，意为“台湾是一个国号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实际意义上就是披着“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皆为“中国”）之皮行“台独”之实，其遮羞布便是“不统、不独、不武”。

面对此等分裂论调，1996年的台湾“皇位”选举自然就成了威胁中国统一的政治事件。大陆方面积极开展大规模“三军演习”，展示维护祖国统一之决心。但岛内分裂集团却绑架民意，将大陆对分裂分子的威慑定性为对台湾人民的威慑，进一步巩固权利。此次选举中，李登辉顺利当选，登上“皇位”，坐稳了大位。李登辉的最后一步棋便是分裂国民党，完成本省人对蒋家政权的最终复仇。上文早已提及，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时地位不稳，宋楚瑜及时出手稳住政局，但在此之后李登辉通过权术打击宋楚瑜，“李宋”翻脸。2000年选举按照论资排辈，国民党会推出时任领导人的连战为候选人，而宋楚瑜才是国民党实干家与外省人的代表，党内都希望宋楚瑜配合连战，但宋楚瑜不甘屈居人下，便脱离国民党创立亲民党、自行参选。

李登辉趁势撕破伪装，直接抛出他分裂中国的最后一枚棋子。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李登辉表示：“两岸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即世人皆知的“两国论”。此举协助岛内独派，打压了宋楚瑜。宋楚瑜担任台湾“皇帝”期间政绩突出，支持者不分蓝绿，但李登辉一计阴招撕裂蓝绿选民，导致宋楚瑜无论支持或反对“两国论”，都会失去一半阵营的选票。李登辉一计施后再施一计，公开检举宋楚瑜之子贪污，使得宋团队方寸大乱。但由于宋楚瑜支持率颇高，“宋陈”二人选情焦灼，依旧使连战无法望其项背，所以在选前一周，李登辉为使宋楚瑜败选，甚至选择“弃连保扁”，即就算国民党输，也不能让宋楚瑜赢。

1950年陈水扁于台南一户**贫困人家**出生，其父通过给人当长工来养活一家人。陈水扁属于典型“知识改变命运”的代表人物，一路考到台湾大学法律系，并在1973年以状元成绩，考取当年的律师资格证。年轻有为的陈水扁结识了医生家庭的小姐吴淑珍。陈水扁可以说是“成也吴淑珍，败也吴淑珍”，此为后话。陈水扁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大毕业以后，依靠岳父的资助成立了私人律所，极大改善了其家庭经济状况。上文早已提及，发生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陈水扁作为辩护律师一炮成名，成功出圈，步入政界。2000年，面对分裂的国民党，陈水扁走年轻路线。当时人们就说“民进党很会搞选举，弄得跟联欢晚会一样，一会唱一会跳”，此等行为可以将民众带到集体狂热的境界。结果即陈水扁取得497万票，宋楚瑜取得466万票，连战取得292万票。陈水扁只比宋楚瑜

多出三十一万票，而若国民党未曾分裂，宋楚瑜连战联手完全可能胜选。

李登辉完成了其计划，在国民党的一片骂声中，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正式就任台湾“皇帝”，完成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标志着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统治结束。

民进党突得大权，面临四大问题。

第一是夺权不彻底：陈水扁执政8年，民进党始终未夺得“立法院”的多数席位。立法权不在手上，绿营政策便推不下去。

第二是两岸关系：民进党靠“台独”起家，如今当权，选民便要其兑现承诺。当然，世人皆知“台独”之不可能，所谓承诺则都是为了获得选票的工具，但总要有个交代。于是，陈水扁在任内废除了“蒋家”时期制定的，旨在统一中国的《国家统一纲领》，实质上放弃了“国家统一”的目标。

第三是缺乏经验：民进党在此前一直是街头政治组织，知道如何推翻旧社会，但不知道如何建设新社会。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于是绿营大量启用中立或反国民党官僚，比如时任“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的蔡英文就于2004年加入民进党。

第四是“蛋糕”分配问题：一同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如何分配所得利益便成为了民进党当权后的大问题。首先，新加入的官僚们掌握行政权，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右派，所以不支持党内激进的左派思想抬头。久而久之，“美丽岛大审”中那批，真正怀揣所谓“革命理想”的先辈被排挤出了核心，只剩下没有理想、靠粗糙的“台独”思想捆绑选民的律师和官僚，霸占了民进党的权力中心，逐步形成了“四大天王”即吕秀莲、游锡堃、苏贞昌和谢长廷，其中只有吕秀莲一人为美丽岛杂志成员，游锡堃为政客出身，而苏贞昌和谢长廷则皆为律师出身。

那陈水扁呢？只能说“穷怕了”，**穷儿乍富、疯狂贪污**。陈水扁的小集体“吃相”极其难看，其妻吴淑珍仅首饰一项就贪污五千多万新台币，最后得罪了所有势力。带领民进党首次夺得大权之人最终落得个爹不亲娘不爱的下场。

下台以后，发监服刑。在败给民进党之后，国民党痛定思痛，**进行党务再造**。李登辉执政期间，国民党大分裂，官二代组建“新党”，宋楚瑜组建“亲民党”；赶走李登辉后，国民党将他们又重新团结了起来。如担任过“参谋总长”和“行政院长”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郝伯村，其子郝龙斌，就是1994年加入“新党”，2006年又折返回到国民党，成为“亲马英九派”。马英九离任台北市长以后，郝龙斌直接空降竞选台北市长，得到蓝营背书，轻松当选。2004年“皇位”选举，连战联合宋楚瑜出战，声势逼人。结果是绿营遭遇状况，陈水扁遭遇“暗杀”，肚皮擦伤，一时间岛内哗然，最终蓝营仅以3万票之差败选。该子弹是确有其人还是自导自演？总而言之，陈水扁的8年做得很不怎么样，岛内怨声载道。早年靠反国民党威权统治积攒下的资本已如数败尽。

2008年，蓝营推出马英九竞选“皇帝”，以60%的得票轻松当选，开启了“马英九时代”。同年5月，马英九上台。

马英九同陈水扁是平辈，同是1950年生人，但是马英九的家境较陈水扁是天差地别——其父马鹤凌为国民党纪委会副主任，母亲秦厚修为“国防部”公务员，祖父为资本家，外公秦承志为军统之人，其本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省人——出生于香港，1952年才前往台湾，18岁便加入国民党，大学期间曾参与“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运动），大学毕业后于“海军”服役，退伍后前往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981年返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1984年开始负责政党外交工作，1988年

担任“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执行秘书”（陆委会前身）。蒋经国死后，马英九同宋楚瑜一样，站在了李登辉一方，后来自是前途无量。1993年出任“法务部部长”。期间，他大力反腐，半年间查处341个县市“议员”，李登辉斥责其为“靠毁党来积攒个人声望的机会主义反党人士”。1996年将其左迁，贬为闲官。1998年马英九一举以64%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长”，直至今日仍为“台北市长”选举的最高纪录。2008年“皇位”选举中，马英九大胜。而同陈水扁不同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的8年中，国民党始终保持了“立法院”过半数的多数席位，行政立法一把抓。

国民党有执政经验，也独揽大权，若真想做事，其实极为方便。但马英九的个人特点逐渐浮出水面，马英九同陈水扁一样，虽带领政党赢得选举，但**都属于弱主，在党内缺乏自己的派系。在两岸关系上，他强调维持现状，也就是所谓“不统、不独、不武”，但除此之外，他尽力捆绑住大陆的经济发展，将台湾绑在大陆经济发展的列车上，使得台湾在那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两岸同胞期待30年之久的“三通”得以实现，即“通邮、通商、通航”。大陆企业开始赴台投资，两岸经济合作全面启动。**8年时间，两岸贸易从1200亿提升至近20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提升至三成多，简而言之，如果没有两岸经贸往来，8年台湾外贸会减少7344亿美元顺差，岛内经济与就业远达不到目前水平。目前有大约200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与工作，他们基本都是马英九时代涌进来的。稳定的政治气氛改善了台湾的外部环境，很多国家打消了与台湾加深经贸合作的顾虑，提供技术支持，间接提升了台湾产业竞争力。在届满前，两岸互信达到历史高点，领导人之间实现了会面。

但统独议题导致大陆发展的红利只有蓝营可“吃”，绿营“吃不到”，“吃不到”就会眼红，眼红就要骂人，所以国民党便被民进党贴上“卖台”的标签。久而久之，统独议题捆绑下的蓝绿矛盾越来越激烈，甚至形成了“景观式”对抗，也就是**你做什么并不重要，你做什么我都反对**。马英九在政坛有一个外号，叫做“不粘锅”，即不贪污，也不做越线之事。故他留下了许多“烂尾工程”。

台湾制造业发达，用电需求大，故自80年代起就立项建造龙门核电站，即所谓第四个核电站，简称“核四”。但是历经波折，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后，台湾岛内十分反对发展核电，国民党凭借“立法院”的人数优势，**拨款强推“核四”**。直至2013年项目完工，只要按下按钮便可开始发电，但民进党坚持反对，所谓“用爱发电”的梗（民进党组织群众手持“用爱发电”横幅游行，甚至成立了“用爱发电大队”来反对核电站）便是在此期间出现的。面对环保的争论，马英九索性将完工后的核电站封存，是否使用交由后人决定。马英九有没有魄力？没有？吵了几十年的核电站被他建成。有？他就是不按按钮，害怕背上骂名。

2010年，马英九翻新**扩建了深澳燃煤火电站**，规划发电量是此前的四倍，压着8年届满下台的时间修建完成，按按钮的难题又丢给了后人。

“台军”亦是在马英九时期腐烂。2008年“台军”总兵力27万，技术、兵器水平尚可，国民党上台当年“顺应名义”推行1年兵役，2013年又缩短为4个月，刚学会列队就退伍。募兵三心二意（招士兵、谋私利）。如今，“台军”只剩18万“草莓兵”，将军反倒有280多个，装备日益老化。

当年的街头组织和反动残余，也在马英九时代一同转型成功，蓝绿两党成为典型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议会党，借助工商资产阶级和农村“桩脚”的支持，国民党取得百万农会选票和大量竞选资金还有125万“军公教”和375万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民进党方面则以“台独”思想为基础，借助社会停滞的现状，笼

络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蔡英文又带来了年轻女性和“LGBT”票仓，扶持亲绿企业，打击国民党的泛蓝企业。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二者属于一个目标各自表述，两党都想维持现状，因为统一将敲碎他们作威作福的小“朝廷”，但独立毫无势力，所以最后就表现为，国民党喊着“不统、不独、不武”；民进党喊着“我们要独立”，说到底皆为绑架台湾人民的选举语言，关键是获得钱与权。

由于马英九“不粘锅”的态度，其任内虽借势大陆带来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停滞导致经济发展“小惠未遍”未惠及底层，而是富了蓝色资本家，也计划了蓝绿恶斗，加上不愿意背上骂名而做事留尾巴的行为，导致马英九时代末期支持率已跌至20%。2014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一举拿下13个“直辖市市长”以及“县市长”的位置，无党派人士拿了3个，而国民党只拿到6个——一口气丢了9个，其中蓝营重镇台北市竟然丢给了无党籍的柯文哲。很明显，人民群众对于这种蓝绿恶斗以及不厌其烦了。

2016年马英九下台，面对声势如日中天的蔡英文，国民党上下皆知此次选举必败，党内万马齐喑。初选时，几个老头子都不登记参选，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成为这个必败的候选人，结果仅有“统派”女性的洪秀柱一人登记参选。真如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所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些党内元老不曾想到的是，洪秀柱是一个“统派”，而且被台湾社会舆论认为是一个“急统”派，国民党宣称洪秀柱背离主流民意，通过政治操作，把通过民主程序提名的洪秀柱的候选人资格废止了。2008年民进党惨败，对于政党来说，不当权就没有利益，在党内装大，属于圈地自萌，元老们知道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已经受不了这些老头子老太太了，他们索性一同淡出政坛给年轻人让路，而这个被选中的年轻人便是蔡英文。蔡英文同民进党元老不同，她甚至并非底层出身，其父二战时在大连为日本人修飞机，战后回到台湾创业，在台北市中心购入大量地皮，是个大地主。蔡英文从小养尊处优，家中别墅就建在阳明山上，与蒋介石算邻居。她的教育过程也是精英主义，台大法学系、英美留学拿博士，说到底她和“连战派”属于一类人，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她和民进党内的基本盘不能融洽，无法建立派系来挑战党内元老们的权威，属于弱势领导人。元老们可以放心为其背书，因为她没有自己的派系，便形成了“绿营团结一致推‘小英’”的结构。国民党却再一次体现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传统艺能，结果可想而知。台湾便从此进入“蔡英文时代”。

看清岛内政治生态和真面目以后，大陆方面也迅速制定了更加脚踏实地、直指人心的两岸政策，不再让岛内的“政棍”做中间人“赚差价”，优惠政策直接给到台湾人民，让他们可以享受同大陆人一样的待遇，亲身体验祖国母亲的温暖。至此，《台湾演义》便需由后人增添了……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为何三年而败？

理自 459584 -3152626835

从 1948 年 9 月开始一直到 1949 年 1 月，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决定中国内战走向的三场关键性战役依次打响。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产党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使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

“翻盘”对于蒋介石而言，开始成为一种奢望。在总计为期 3 年的内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面对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的红军时，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在一些关键性的战役中连战连败，最后不得不丢盔弃甲，败走台湾。

我相信以上史实想必大部分中国人都烂熟于心，而对于解放战争中为何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溃败，历来也充满了各种争议和讨论。如果我们翻开历史课本，会发现教科书给我们总结了大概四个原因：

从政治层面来讲，是因为国民党政治孤立、失去民心，强行发动内战导致全国人民一致反对；

从军事层面来讲，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军队厌战、士气低落，临阵起义和叛逃的事件不断发生；

从经济层面来讲，是由于国民党贪官横行，统治腐败，导致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从外交层面来讲，是因为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并挑起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造成了蒋桂分裂。

除了以上四种被官方认可的原因之外，在网上还存在着其他众多的原因分析，比如“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论”、“蒋介石用人不当论”、“军事战术失误论”等等。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些原因便会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有道理，但却始终让人感觉还不够深入，并为抓住问题之本质。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那么一个有着近千万党员、五百多万军队、占据着中国绝大部分国土又有美国支援的国民党，究竟是如何做到 3 年便败走台湾的？究竟哪一种原因才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呢？这个答案，我认为恐怕还得回到国民党的内部去寻找。

注意：以下内容是我与小伙伴根据现有论文和史料，进行综合分析以及逻辑推演而来，仅代表我们自己的思考，你可以赞同亦可不赞同，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有疑问欢迎举证讨论，但我们不接受任何“扣帽子”的行为。同时，本文只讨论国民党一侧之问题，解放战争的胜利固然有共产党自身的努力，但这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故本文若未提及共产党的努力，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共产党的作用。如果你明白了我们的立场，欢迎你继续阅读，否则现在合上书的话还来得及。

这一切问题的源头，我们认为还得追溯至 1923 年。

在这一年的 6 月 12 日至 20 日，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会最后通过了该提议，并且决定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组织上的独立性，帮助国民党改组为一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半年以后，

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以大会宣言的方式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同意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形式。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我们通常的记忆中，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就开始进入到了国民革命运动时期。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12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1925年春季和秋季，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为次年进一步北伐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剑指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至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时，吴佩孚和孙传芳已经基本被消灭，国民革命的力量轰动一时，统一全国似近在眼前。

在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清党行动，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称其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制造了多场针对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屠杀。著名的共产党员，如李大钊、汪寿华、萧楚女等被杀害。3个月后的7月15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甚至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对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逮捕和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场血泊中宣告失败。

现在的教科书和通俗历史读物中，一般会将此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以及共产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放弃了对合作以及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然而在这种结论下，我们很容易将这段历史看作是一段静态的历史，好似自国共开始合作以后便始终顺利，而蒋介石则是一个始终潜伏于革命队伍中的叛徒，随时准备着进行政变。但如果我们多翻阅一些资料，并且将这段历史放到一个动态的视角，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元老，并非一开始就对共产党有如此巨大的杀心，他们的心态和行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惜冒着大革命失败的风险，也要发动这一次清党行动？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又需要回到1924年。

上文说过，在国民党一大上，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党以个人为单位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建议。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国民党称作“容共”，也就是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这里能很明显看出，国民党认为自身高于共产党，所以便使用了这一的词汇；而共产党为体现自身与国民党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则通常使用“联共”即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容共”与“联共”二词在整个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始终是交叉使用，动态变化。此处作历史说明，以免引起混淆。

那么在1924年一时来看，两党究竟孰大？谁更有话语权呢？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共产党全国上下共有400多个党员；国民党号称有20多万党员，光是广州国民党分布便有三万党员。此差距不可谓之不大。而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所记来看，虽国民党号称广州分布有3万党员，但实际到了改组的时候，登记上报的名字仅3000余人，党与党员间的联系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无任何联系。当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根本不具备任何战斗力。所以可以得知，当时国民党的实际党员数量，依然要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多上好几倍。然而就战斗力来讲，国民党不一定比共产党更强大。

让人没想到的是，再后来3年的合作中，这种猜测被共产党证实了。孙中山

原本期望的“容共”，到后来已经慢慢变成了“容国”。国民党几乎走到了被共产党完全同化的边缘。这里举相关史料中记载的案例，了解并体会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的能力。

在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已经有大约 90% 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部分非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地方，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1926 年 11 月，陈独秀在《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的“包办”之下。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情愿直接与共产党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毫无用处。该《报告》节选如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国民党，怀疑国民党能不能革命？国民党是否站得住？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国民党不革命了，还是要共产党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共产党意见，共产党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共产党包办，共产党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共产党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共产党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共产党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国民党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国民党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共产党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共产党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共产党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共产党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国民党不行了，革命还是共产党；谭延及其部下说国民党没有力量，还是共产党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国民党已无用而须共产党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

（1）共产党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

（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国民党，便是完全让

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比如 1926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二号——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非常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原文如下。

今日（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各报皆载有孙传芳致蒋介石书，兹剪上一份以作参考。其主要意旨是劝蒋排除俄国人与过激派，“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又谓：“如易帜而来，必尽东道之谊，否则将以讨赤御外相周旋”。

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

1. 联俄联共政策是先总理生前决定，国民党大会通过，并非蒋介石所创。反对此政策即是反对先总理，反对国民党。

2. 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军阀政治，必须结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内革命的党派才能增厚革命的势力，所以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对的，是革命的政策，且并不因此而失却国民党之独立，正足以表现国民党之革命；孙而反对此政策，则孙亦在被革命之列。

在我校的机关报上宣传，则当用很犀利尖刻的文字来反对右派及孙传芳，籍〔借〕此给右派一很大打击。要点是：

1. 右派平日高唱反共反俄反对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现在孙传芳可与他们作同志（据我们所得消息，右派确与孙勾结，孙之此信亦为右派分子手笔）。

2. 孙传芳劝蒋勿用外人，但广东政府所用之外人，决不会效法上海外人之指挥孙者指挥蒋，决不会叫蒋效孙奉外人之命而杀刘华。

3. 孙谓如去外人除过激派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可保证一切问题均可得中正适当解决。我们当抬出孙之丑史，劝孙勿说此大话，当新直系运动失败时，孙对吴恐慌万分，几十列车的军械运送保定，百万巨款效纳军前，放还盐税收入，派兵出发江西，战战兢兢，惟恐吴之议其罪，今乃高视大言，谓自己能力可以解决一切，实太不自量。

李承宣

中共中央竟能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直接下发训令，可见其“包办”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共产党在一边包办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运行的同时，也在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员和团员。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来的大学生多达 300 多人。当时广州中共中央党员总数才大约 2000 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 400 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 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 3/4。在中国共产党强势的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或“赤化”。比如中共中央在 1926 年 9 月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261 页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 80% 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

法，即“国民党其实已经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

实际上包括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左派”、“右派”、“左倾”、“右倾”等词汇皆由共产党的宣传系统在当时发明出来的，而且更为巧妙的是，共产党将左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将右和“反动”联系了起来，从而垄断了对于革命的解释权。只要一旦给人扣上了右派或者右倾的帽子，此人便立即被打入反革命队伍，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并言：“多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出了‘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魔，立即瘫痪而退。”当时国民党内除了整体尚左贬右以外，“无”比“资”好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一种主流认知。因为依照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所以大量的青年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下，抢着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就连许多国民党人都不愿意别人称自己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与侮辱。此外，由于共产党一直宣称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一个过渡阶段，此后还有社会主义革命。故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民党在潜移默化中被共产党放在了一个过渡政党的地位上，与共产党形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但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时代”。这一类极富想象力、创造力与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新青年的胃口，使得大量的知识青年倒向了共产党。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夕，“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已经变成了街头最时髦和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无论什么团体开会都会会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会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是三大政策。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让当时的国民党人觉得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这种情况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和中间派产生了高度的警惕和怀疑，他们看着国民党一步步地被共产党蚕食和同化却没有丝毫办法。所以蒋介石就在这种他以为的国民党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行动，试图彻底把共产党的影响力从国民党的内部予以清除。但由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是保密的，而国民党员的身份却是公开的，所以蒋介石并不知道党内到底哪些是国民党人，哪些是共产党人。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之下，决定同时对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整个国民党左派下手，因为在当时许多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实际上已经比共产党还要左了。对于蒋介石而言确实没有去仔细分辨的必要。

那么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党行动到底给国民党带来了什么后果呢？首先，蒋介石达到了他将共产党人和党内极端左派清楚出党的效果，但这一行动同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负面效应：在国民革命期间由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体系被摧毁殆尽，国民党的各县乡村级基层组织完全瓦解。这使得国民党基本丧失了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应该具备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党员管理能力，因为在1924年至1927年的3年间，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承担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党务工作。蒋介石将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无异于自废双腿，下半身截肢。从此国民党便成为了一个高高在上，只有中上层，没有基层的党。如此形容依然有些抽象，以下将列举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例子以展示全面抗战的8年间，国民党的党员管理工作究竟何种混乱程度。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的新政策，将入党的门槛基本

降到了不存在的程度。当时行此策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增长到了接近 80 万，这使国民党十分恐慌；二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个“三青团”在与党的机器进行资源争夺，故蒋介石需要大量补充新党员，一边强化国民党的力量以及补充在战争中流失的党员。从 1939 年该政策执行始计至 1945 年的 6 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的数量平均以每年 30 到 40 万人的数量在增长，至 1945 年底，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已达 311 万人之多，倘若算上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党员总数则逾 800 万人。同时期“三青团”和共产党的人数分别为 124 万人和 121 万人。

那么国民党的耀眼成绩具体都是通过何种方式得来的呢？

首先，国民党强制全国所有在职官僚和机关公务人员入党，对这些公职人员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审查和筛选。全员皆党的后果就是全员皆非党，党籍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党员在政府机关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相反，大批腐化、颓化的官僚政客涌入党的队伍后，严重侵蚀和破坏了党的声誉。许多旧权力精英和地方保守势力以及土豪劣绅乘机加入国民党，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认同国民党的精神和纲领，他们加入国民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继续保住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持旧的社会秩序。

其次，国民党同样也强制要求军人必须全体入党。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有 400 多万军队党员，无一不是集体入党的产物。这就使得全体官兵皆党员，数百万军队党员完全徒有虚名，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完全起不到丝毫作用。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除了有对公职人员和军人的强制要求以外，在普通党员的吸收上也同样是五花八门。首先，在 1938 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废除了预备党员制度，入党即正式党员。而后从抗日战争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名为扩大征求新党员的运动，曾提出要创造 1000 万党员的目标。千万党员从何来？中央组织部随即强行给各省下达征收指标，各省又将中央下达的指标分配到各县。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县党部普遍存在缺人又缺钱的情况，难以承担上级下达的征收指标。同时由于上文所述，国民党因 1927 年的清党行动所带来的基层党组织残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县级以下的党组织基本都有名无实，完全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中央分配的任务指标，国民党的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强制、欺骗、利诱、造假等花样百出的手段吸收党员。比如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农用贷款的机会，强制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民必须同时填写入党志愿书，否则拒绝发放贷款；有的县党部为了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放粮食，导致许多等米下锅的农民加入了国民党；有的为了领粮食还替自己的儿女亲友报了名。利用此等手段，有的村几乎全员入党，还有的根据县党部掌握的各种群体团体的成员名册，直接整本造假上报。这些弄虚作假的手段导致有的区分部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区分部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党员，很多党员不知道自己党籍在何处，甚至还有人连自己是不是党员都不知道。

（故在 1949 年建国以后，共产党开展针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查工作时，发现这项工作非常之棘手，因为面对海量的国民党员名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入过国民党或者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什么职务。）当时还有部分地区党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人入党后因为基层党部办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党员自动脱党或者重复入党属于家常便饭。有的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入一次党，入党两次三次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人入党五次六次。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对于自己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之混乱令人咋舌。

这些操作带来的结果就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空、穷、弱、散的情况，毫无战斗力可言。中央的命令根本无法有效地传达到基层，而基层也无法向上级反映真实的情况。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基层组织队内不能约束党员，对外不能指导政府，甚至对政府连批评都不敢批评。此情就导致了党的意志和纲领无法有效地转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被极大地削弱。然而就是在国民党一味追求这些虚假的党员人数之时，共产党却在后方进行着整党整风的运动，通过各种方法凝聚自己的党员和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

所以现在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在解放战争前拥有近千万党员，500多万军队，占领着绝大多数国土面积还有美国支援的国民党会仅仅3年会一触即溃？

答案早已浮出水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1927年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巨大的力量，蒋介石以为只要抓住了大资本家富豪以及上层人士，便抓住了未来。然而现实却是，从1840年中国开始走向近现代以来，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谁能把握住这股力量，谁才能说自己真正抓住了未来。

文章引用文献因篇幅过长而于此省略，若有需要请联系 Me

日月精华

贫穷的谎言——因愚而穷？

理自 3152626835

“贫穷源于愚蠢”、“你穷是因为你太笨”、“智商高的人赚到钱是应该的”，也许这些话你在生活当中都听过；也许你对这些意识形态语言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智商与贫穷的流行性话语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以来最大的、却也最有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谎言之一，而它的辐射范围也远远不止西方世界。

这套理论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而后在 90 年代中叶随着一本由两位生物学家所写的《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的流行科普书籍成为了西方保守主义阵营最强大的武器，它也被称为“贫富生物论”（The Biogenetic Theory of Poverty）。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不多见的系统性地、用看似符合生物学学术标准的方法，为社会不平等现象辩护的一本“巨著”。在其出版后，由于美国各大财团和企业主的资助和背书，它的影响力逐渐已经超过了这本书本身，而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各种偏见、刻板印象和阶级话术融合，最终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标准意识形态语言之一。

与强调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分配制度对贫富差距所造成影响的现代社会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贫富生物论的保守主义学者坚信，对人们的生活前景影响最深刻的事物，不是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分配制度，而是他们天生的智力水平。根据《钟形曲线》的作者赫伦斯坦的说法：现代人类社会、尤其是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被隔离成不平等的社会阶层，但这种新的阶层体系中的“决定性分裂力量”不是不平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制度，而是遗传的“认知能力”或者说“智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区别在本质上是聪明人和愚蠢人的区别；教育成就、职业成就和其他社会成果的不平等是由于认知能力的遗传差异，被赋予高智商的人注定是富有的，中等智商的人则被划入中产阶级，而低智商的人注定一生贫困；不管他们的出生环境如何，聪明的人会上升到顶端，而愚蠢的人则永远会在底层苦苦挣扎。最后他认为，按种族和民族划分智力分布也不均衡：黑人普遍不如白人聪明，这种智力差距是解释种族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原因，而种族歧视在美国则根本不存在。

根据赫伦斯坦的说法，有两项积极的社会发展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以至于让认知能力或者说智商成为了决定经济成功的关键，最终实现了最公平的社会制度，并且应该推广到全世界。

一：现代美国实现了大规模的机会平等。这减少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背景对个人成就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人们现在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争夺上学和工作的机会。这场比赛的输赢取决于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而价值主要是由一

个人的智力来决定的。

二：经济的技术升级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复杂认知技能的工人。今天的高科技经济重视智力，其结果是拥有必要脑力的高智商人群和不具备必要脑力的低智商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现代“技术社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上层阶级，一个“认知精英”凭借其卓越的智力所垄断的阶级。

于是，对于赫伦斯坦来说，美国的阶级分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认知分化：富裕的聪明人在阶级光谱的一端，贫穷的愚蠢人则在另一端。如今让人们进入好学校和获得好工作的是智商，而不是家庭地位、继承的财富或社会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任何具有必要知识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同样的“认知划分”也发生在职业系统中，因为工人是根据他的智商来划分工作的。

在现代的“精英政治”（Meritocracy）或者叫“英才教育”，即精英选拔、英才治理下，个人在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进步程度取决于他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高智商导致成功，低智商导致失败。要改变这种平衡也没什么办法，至少无法在不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情况下做到。

总之，天生的认知能力控制着进入教育机构和职业岗位的机会，是谁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赫伦斯坦总结到：“综合起来看，美国经济的成功和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越来越成为人们遗传基因的问题。”根据赫伦斯坦的说法，由于低认知能力通常与“社会不良行为”相关联，因此不太聪明的人不仅在经济流动性方面受到阻碍，他还往往会给其他人带来问题，低智商人群是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源：“有大量的国家社会政策议程是在为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服务，而这些人认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大量福利政策都失败了。”

这种生物决定论显然是愚蠢且荒谬的，但更关键的——它有两个极其邪恶的、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假设，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秩序最强大的护教学之一。

一．效率假说：既然每个人的地位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有些人天生比你聪明，他创造的价值就是比你高、就是比你有用，所以你活该很穷。你的贫穷和他人的富有是一种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二．公平假说：这个基于生物秩序的现代经济制度是绝对公平、不偏私的，人类不需要任何经济再分配制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怎么做都是“福报”。走上高位的并不是因为出身或运气比你好好亦或者制度腐败，而是因为人家天生就聪明，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是绝对完美的，任何的反抗都是一种不公平，是愚蠢的人企图获得更多的东西。

为了系统地批驳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观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指出赫伦斯坦理论的五个关键弱点：

1. 他的论点基于机会平等的错误假设。
2. 他歪曲了智商和贫困之间的关系。
3. 他对人们如何求职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分析。
4. 他未能从总体而非个体层面上认识 and 解决贫困问题。
5. 这套理论隐含的个人主义假设使他看不到贫困的结构性原因。

1. 机会是平等的吗？

赫伦斯坦坚持认为：在现代美国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争

夺学校和工作机会，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智商和认知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社会地位。

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职业体系都信奉“精英政治”理念，即相信所谓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英才化制度。儿童从他开始学习的第一刻起就遭遇了巨大的、积累的教育不平等。贫困儿童不太可能接受高质量的儿童护理，参加高质量的学前项目或受益于利于认知刺激的家庭环境。当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时，他已经远远落后于更富裕的同龄人。一旦他进入了高度隔离的学校系统，挤进这个国家最差的教室，他就会遇到新一轮的不利条件。

虽然赫伦斯坦宣称“高等教育民主化”，但最近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国学生上大学的阶级差距越来越大，预算限制、学费上涨、经济援助减少和家庭收入停滞不前的综合因素，使得许多合格的学生负担不起高等教育。事实上，作为获得大学学位的决定因素，**金钱远比智商更重要**。

正如彼得萨克斯所言：“在美国，一个富有的低成就者比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成就学生有更大机会进入大学。”此外，赫伦斯坦也没有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一组经济学家（Joe L. Kincheloe, Shirley R. Steinberg, and Aaron D. Gresson III, et al）利用“钟形曲线”中使用的相同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相同的认知能力水平下，在美国，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白人男性，一个白人即使智商相对较低，也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一个黑人或一个非裔美国人即使智商相对较高，也可能挣扎在贫困线上。这些经济学家总结说，关于收入的数据“与赫伦斯坦关于劳动力市场英才化的说法不一致”，证据显示，与精英政治的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理想相反——女性和少数种族无法像白人男性一样最大化利用他的认知能力，即使机会均等和认知能力是经济成果的主要决定因素，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的贫困率也大大高于预期。更广泛地说，以赫伦斯坦为首的保守主义力量本质上拒绝承认生活机会是如何由“持久的不平等”构成的，也拒绝承认这种不平等是通过家庭和社会阶级传递的。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设计不平等》一书所总结的那样：“父母的优势——财产、学习能力、个人交往、实用手艺、社交技能、文化工具等等——会传递给他的孩子，也会从一个社区的年长者传递给年轻者，同样，**劣势也在传递**。”没错，与赫伦斯坦的假设相反，无论是教育系统还是职业系统都不值得打上精英政治这个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标签。在获得教育和就业方面，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有限，而是因为他获得优质教育和获得体面工作机会有限。赫伦斯坦仅仅是希望以此淡化阶层不平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持续性的不利条件。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哪怕在**部分国家**存在一种比腐朽的美国制度更先进的、更公平的，期望以“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为唯一标准的阶级晋升和教育选拔手段，由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它也不可能是绝对公平的。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身份的人，注定有着不同的起点。一个相对进步的制度是社会进步的起点，但必定不会是社会进步的终点。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当制度的设计者自己都开始着手改革一个制度时，究竟是哪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站到制度设计者和人民的对立面。

2. 智商和贫富的相关性问题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低智商的人比高智商的人更容易贫穷。然而，到底贫穷导致低智商，还是低智商导致贫穷？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赫伦斯坦在处理智商和贫困关联的相关性问题时，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把智力当作原因，从不把它当作结果，他拒绝将智力视为“对社会条件的反应”。

第二，他把贫困当作结果，从不把它当作原因，他拒绝将贫困视为被塑造的个人行为和复杂的生活路径的组合产物。

而事实是，当贫穷的孩子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他住在糟糕的房子、混乱的社区里，上最差的学校；他不得不承受营养不足的饮食和不良的身心状况；他会经历偏见、歧视和社会孤立。出身贫困的孩子们永远面临着多重的和累积的不利条件。他的一生都可能过着紧张和拮据的生活。如果这样，他的纸面智商分数很高，那才简直是奇迹。

可以这么说，通过淡化社会环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赫伦斯坦可以说是忽略了一个解释智商和贫困之间相关性的理论，那就是：“**并不是低智商导致地位低下；而是地位低下导致智力测试分数低。**”贫穷在本质上阻碍了认知功能的充分发展，低收入家庭往往缺乏必要的经济手段、社会支持和机构资源来充分培养其子女的能力和才能。富家子弟在智商测试的得分较高，主要是因为他在资源和机会丰富的富裕环境中长大；而穷孩子在这类测试中得分较低，主要是因为他在资源和机会匮乏的环境中长大。是的，人们的根本问题是贫穷，而不是智商。倒果为因可以成为某些人的保护伞，但这个世界不易的真理是水滴石穿，更何况是倾盆暴雨。

3. 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吗？

赫伦斯坦声称，通过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个人将根据他的认知能力被分类到职业系统中，智力的差异由此转化为收入的差异——高智商工人被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低智商工人被安排到不好的工作岗位，如果他不是完全多余的话。这种职业分类的过程对于赫伦斯坦来说，是**统一的、客观的、理性的、不可避免的和任人唯贤的**：

统一的，因为所有雇主**评价工人的标准**本质上是相同的；

客观的，因为**筛选过程**相对没有主观判断、偏见和错误印象；

理性的，因为它使**效率**最大化；

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必然是**技术工业社会**的唯一选择；

任人唯贤的，因为它保证了能力是某些人取得领先的主要**决定因素**。

赫伦斯坦的职业分类理论进行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假设：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唯一障碍是低智商。然而，正如大量社会科学文献所显示的，独立于认知能力之外，个人可能会因其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和性偏好等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他可能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证明渠道而被挤出工作轨道；他可能非常适合一份工作，但不知道这个工作有空缺或者这个工作需要内推资格；雇主可能会忽略有足够认知能力的候选人，因为他来自错误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有错误的证书、

来自错误的社区；认知错误的人，有错误的外貌或者说话口音不正确。

每一个在找工作的人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拒绝，无论是他被认为缺乏正确的工作态度、忠诚度、纪律性、兼容性、人际交往能力或服从权威的意愿。职业分类过程太混乱了，无法想象工人主要是根据他的“一般智力”来匹配工作。一个好的贫困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个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失败，而认为这仅仅是一些人智商低的问题是不可信的。但这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意识形态谎言。

4. 个人主义为什么是错的

最后，《钟形曲线》暗含了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就是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微观性的“个人主义偏见”。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研究者会预先将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描述为可以由单一个体主观性控制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s），而不是超出单一个体掌握的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s）。由此，贫困便成为了纯粹是由个人不当行为引起的个人问题，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无关：贫困是低智商人群陷入的困境，因为低智商人群在学校和工作中无法与高智商人群竞争，并且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与其说贫困是社会的一种状况，不如说它是个人低下的禀赋和越轨行为的一个结果。

然而，从这点来看，这套理论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学术理论的严谨性，而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传声筒，因为它的个人主义偏见放弃了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对变量条件和更广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尊敬。在《钟形曲线》的作者赫伦斯坦看来，像贫困这么复杂的现象居然可以归因到一个简单的单一变量身上。他不仅否认家庭环境对人们经济成果的影响，还要求我们相信贫困发生率与经济状况或政府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无关。

如果他是真心相信这一点而非出于利益驱动而写下这本书，那这便是一件极可悲的事情。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赫伦斯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结构性把握贫困问题的方法路径，纯粹从个体的微观视角上去认识“贫困”这个现象，这便很难不得出错误的结论。

5. 贫困为什么必须是一个总体理论

《钟形曲线》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最具压迫性的一点是，它只关注单一个体的贫困成因而拒绝提供一个关于贫困和不平等的总体性理论。换句话说，它希望让所有人关注“一个人”为什么会贫穷，就仿佛贫穷是“一个人”的行差踏错所带来的悲剧性结果，或者说只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事实绝非如此，贫穷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群体性的、阶级性的现象。

因此，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处于职业系统底端的人的劳动报酬比高端的人低得多；或者为什么工人每小时挣 8 美元而不是 16 美元。它无法解释美国经济中，数百万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仍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普通人极其努力也无法赚到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显然不是遗传学的问题。

事实上，赫伦斯坦理论的缺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缺陷本身并不会导致人们变穷，或者说在决定贫富的那些要素里，个人的缺陷和优势从来都不是最关键的。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个没有多少技能的人可能很容易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经济萧条期间，随着工作变得稀缺，同一个人可能最终会失业并进入穷人的行列。

低智商或任何其他个人层面的特征是否会导致贫穷，取决于市场上是否有收入体面的工作。生物遗传理论或许可以预测当经济不景气时谁可能会陷入贫困，但它无法解释贫困率随时间的波动，也无法解释这些波动背后的经济繁荣或萧条的原因。

美国的贫困率从 1989 年的 12.8% 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11.3%，是因为那个时期美国人平均智商激增吗？而为什么在 2000 年以来，贫困率一直在上升？是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平均智力比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低很多，所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最高的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有一部分人的能力和技能不如其他人，但我们是否在贫困线上挣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总体经济局势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最后，我想再进一步批判赫伦斯坦对“智力”这个概念所做论断的学理错误，即指出这套理论哪怕不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学框架下，在一般的认知科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礎上，它也是漏洞百出的。

6. 什么是智力？

“钟形曲线”对人类智力的判断主要由四点组成：

- (1) 智力是一个单一且统一的现象，即所谓由“核心人类心理能力”组成的“一般智力”，这是所有形式的“复杂脑力劳动”的基础。
- (2) 标准化智力测试提供了对一般智力的精确测量，使得根据个体的认知功能能力对其进行线性分级成为可能。
- (3) 智力是“强遗传的”，在个体认知能力的构成中，基因占 40%~80% 的比重。
- (4) 人拥有一个基本上不可改变的、出生时就决定的智力水平。社会和教育干预不能明显提高低智商人群的认知能力。

让我们依次批判这些具有欺骗性意识形态偏见。

首先，现代认知科学和心理学普遍认为，智力是一种多维的现象。当人类处理和认知问题时，在脑中发生的活动并不都是密切相关的，也可能都是“一般智力”的衍生物。

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背景下、某些任务上很聪明，但在其他方面却不聪明：有些人可能有数字的能力；有些人有文字的能力；有的可能有很好的商业意识；有的则有艺术天赋；有些人可能有课堂智慧；有些人可能有街头智慧。在一个领域带来高能力的那种智力禀赋，不一定在另一个领域有相同的回报。“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个人不可能被贴上一种具有“绝对一致性”的聪明或愚蠢的标签归类。因此，他在单一智力测试上的排名不能很好地解释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多维论观点意味着，成功和失败，就与智力有关的程度而言，并不取决于传统智商测试要衡量的单一属性，即所谓的“一般智力”。认知能力有很多种，社会努力也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偏爱某种不同的才能和技能。**因此，智商分数并不能告诉我们人们整体的实践能力，也不能左右社会和经济命运。**

第二，**标准化智力测试只是对成绩的直接测量，而不是能力。**考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从情绪、舒适度到应试体验等任何因素的影响，这种测试只是间接测量能力。即使这样，它们测量的也是“发展后的”能力，即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素质，而不是“天生的”能力——毕竟不可能有人能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完成智力测验。而哪怕作为后天智力的测量，标准化测试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只评估一组特定的应试能力，即在有时间限制的纸笔考试中与成绩相关的技能。它不太擅长测量各种形式的实用智能；日常问题中表现出的认知能力；或者个人在教室和工作场所使用的更广泛的、更依赖于背景的“智识功能”。

事实上，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智商测试衡量的智力和跟广泛的理性，比如反身性、适应性决策、认知灵活性、对不一致的敏感性和对证据的反应性等心理品质之间只有小到中等的相关性，**高智商不是良好思维的必要条件，聪明的人也不能避免愚蠢的行为。**正如理查德·尼斯贝特所说，**理性思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虽然这种学习可能不会给我们更高的纸面智商数据，但它会令我们更聪明，在某些方面也很重要。总的来说通过智商测试衡量的“智力”，并不能涵盖所有有价值的认知特征，也不能可靠的预测人们在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

第三，很多学者认为**钟形曲线高估了智商的遗传基础和遗传率，低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赫伦斯坦计算遗传率的方法，以及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夸大了认知能力是一种天生的、不变的特质，以及智力从一代遗传到下一代的程度。虽然他声称智商的遗传率可能高达 80%，但其他研究在收集了更广泛的数据后表明这个数字要低得多，在 30%到 50%之间。

然而，现实情况甚至更复杂，因为**基因的重要性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对于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来说，物质匮乏抑制了智力潜力的充分发挥。的确，许多专家说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将影响按照一种百分比的实证主义手段来量化。**

第四，根据赫伦斯坦的观点，智力因为它本质上是遗传的，所以不能轻易提高，并且这样做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不会通过外部干预，让孩子变得更聪明来解决。”当然，他也承认提高智商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认为，由于相关知识不足和“可用的社会干预手段”有限，所以这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而是“没有一种便宜可靠的提高智商的方法”。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种政治判断而不是科学判断。**正如詹姆斯·赫克曼所观察到的，赫伦斯坦没有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他的观点。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赫伦斯坦误导性地将**遗传性等同于不变性。**他错误地认为，如果智商有很大的遗传成分，那么社会改革就不能显著提高智力。但正如最新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表示的那样，**智力的可塑性不受遗传性的限制。**

此外，大量的实证证据也无法支持赫伦斯坦对提高认知能力前景的悲观看法。归根到底，对赫伦斯坦等保守主义学者来说，社会帮助和教育干预是无效的，特别在早期生活中是这样。无论我们如何增加儿童的智力，提高他从学校受益的

能力，并帮助他获得技能的研究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其他生物学家反驳了这一点，他认为：“智力可以大大增加，而不需要英雄式的、极其昂贵的干预。”例如，只要简单地改善孩子的产前环境和产妇的生理状况，就能显著提高智商。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拥有高素质教师的学校也能提高贫困儿童的认知技能。

其他研究表明，无论智商如何，学校教育都能改善人们的经济成果。教育政策“有可能减少现有的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切实证证据都表明，与贫富生物论相反，人们的认知能力水平和它的社会经济命运都不是在降生时决定的，更不是不可改变的。

在《钟形曲线》的第二部分中，赫伦斯坦声称要证明相比于其他社会因素，遗传的认知能力对人们的生活境遇有着最大的影响。在这里他通过论证智商比家庭背景、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更重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他想证明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对社会的整体不平等造成影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智力导致的，这和一个人的父母究竟后悔创建了阿里巴巴还是后悔进了电子厂没有一点关系。

在研究了智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各种社会行为的影响后，赫伦斯坦得出结论，智商低下，比家境差劲更容易导致辍学、失业、犯罪。换句话说，智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家庭地位更大。因此，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例如贫困和失业似乎更多是由于缺乏认知能力而不是不利的生活环境，人们在生活中表现不佳，不是因为弱势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智力低下。

然而，人类社会真的已经进步到如此高级、只靠智力禀赋就能实现一切公平的阶段了吗？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用一位社会学家（Lawrence Harrison）的话来说，赫伦斯坦对 SES 的概念是“无法形容的粗糙”，他的 SES 仅由四个变量组成：母亲的教育、父亲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父母的职业地位。

这个指数即使作为家庭背景的衡量标准也是有限的，而作为估计社会和经济劣势的累积影响的工具，它更显得狭隘。这个指数排除了各种重要的社会变量，这些变量基于受访者的父母背景有关，也与受访者自己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关。比如家庭规模和组成、本地教育质量、当地就业机会、社区和邻里特征以及社会交往质量，甚至还有不同时代的经济机遇的差别。

你不能拿一个处于 80 年代末期的人所拥有的机遇，和一个 2022 年的人进行对比。而在使用更精准的社会经济背景测量，对赫伦斯坦的分析进行了多次复制和分析后，社会学家们普遍发现钟形曲线严重低估了社会环境对生活结果的影响。

总得来说，钟形曲线提出了一个过分简单的、却能够讨好美国大财团内部保守主义当权派的关于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理论：即人们贫穷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由遗传决定的认知能力，因此一种严酷的达尔文主义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有益于所有人发展的。

穷人是自身不良基因的受害者，而社会和教育干预对解决穷人基因这个问题无能为力。事实上。只要这个观点只要再进一步发展，就和二战中各种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差别了。很难想象这样一套论调在新世纪初的美国仍然能为人所推崇，而其在流行领域的变种甚至成为了其他国家一些借助时代红利崛起的精英，用来自我加冕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的确，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差异和不平等。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贫富差异带来的人生际遇的改变。当社会学家被要求解释这

种差异时，他必须从**国家、阶层、教育、社会地位等因素**开始分析，并时刻要求自己**对足够多的变量保持敬畏**。但赫伦斯坦提出，人们之所以贫穷，原因很简单，他天生就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认知能力。这种对贫穷的看法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更普遍的不平等生物遗传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我不想在这里总结钟形曲线的众多弱点，但我要重申四个关键问题：

首先，赫伦斯坦自己的统计结果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推翻。数据表明智商的差异只占个人工资和收入差异的很小一部，分约为百分之十。人的经济地位是否不同或是否容易陷入贫困，原因有很多，**认知能力无论是否遗传远不是主导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结果中起着相对较小的作用。

其次，**认知能力和贫困之间的因果相关性研究比任何事都更能证明社会和经济窘迫对孩子考试成绩的影响**。贫富生物理论夸大了智商对贫穷的影响，低估了贫困对智商的影响。

第三，与《钟形曲线》假设相反，研究表明，**社会、政治和教育政策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并可以改善他晚年的经济成果。人的一生机会不是一出生就固定的。

第四，**生物遗传理论完全忽略了无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影响着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贫困率以及穷人所经历的苦难的严重性。

赫伦斯坦的分析与其说是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不如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贫困和不平等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他的理论混合了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很自然地融入了盛行的指责受害者的心态。

虽然赫伦斯坦并不完全认为穷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穷困所负责（毕竟在他看来问题出在穷人的基因身上）。但他的理论同时也并没有将贫困归因于任何形式的不公平或不公正，人们之所以贫穷至少是因为他缺乏遗传的认知能力。

这一结论加剧了一种已经流行的保守犬儒主义，这种保守的犬儒主义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下，人们对人类的政府和社会共同体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普遍怀疑相吻合。

事实上，赫伦斯坦不遗余力地质疑那些旨在实现更大平等或改善穷人经济前景的政策实用性。这本质上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贫困被视为一种准自然现象**。政治议程中没有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愚蠢。这导致不平等加剧和持续与贫困的更大结构性力量被忽视。

赫伦斯坦在美国发现的智商和贫困之间的所谓统计关系不是自然的事实，他是**现有经济和政治游戏规则**的偶然产物。改变规则，智商和贫困的关系也同样改变。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不同的文化规范和理想、不同的公平观念、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则以及不同的社会政策，智商和认知能力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可能会发挥更少或更多的作用。赫伦斯坦认为智力不能提高；**但即使接受这种可疑的说法也并不意味着认知能力低的人注定会贫穷**。

正如《设计不平等》一书的作者所强调的：低智商人群的命运不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决定的，这些是可以改变的。**任何严肃的、关于贫困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学 and 经济学现象的讨论，都不应该臣服于资本脚下、成为资本的传声筒，维护一小部分人的超额利益和错位统治；更不该把一切的过错放置于脆弱的个人身上，而应该着眼于分析更大的被遮蔽的社会图景。**

消费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新宗教

理自 459844 -3152626835

经济危机与消费主义

多年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强有力的叙事下，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被描绘为是一场单纯的周期性金融体系崩溃。然而，在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看来，它更代表着消费资本主义体系所不可避免的一种内爆。的确，在当下，由于广告、市场营销、明星产业和其他的文化规训，人们被教导、被说服，去消费远远超过他们的需要的产品，并常常为了维持理想的生活方式而负债累累。最后，各种次级抵押贷款、即那些将钱贷给无力偿还的消费者的贷款，必将因应这些需求、泛滥于世。事实上，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坏账危机，也正是08危机最主要的导火索之一。

消费主义和次级抵押贷款的泡沫悲剧之间显见的联系向我们证明了，08危机不是一场偶然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恶行、即消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审判。它告诉我们，如果消费文化、尤其是负债购物的消费文化没有得到管理和控制，其中隐含着的自我毁灭的力量，最终导致可怕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创伤和痛苦。然而，令人无奈的事实是，在2020年，美国的家庭消费债务总额比08年时期的13万亿美金不增反降，来到了14.3万亿美金的历史高位。就连中国，在2019年末，我们的家庭消费债务总额也总计来到了47.9万亿人民币，约等于7.2万亿美金的位置，相当于美国的50%。似乎，无论事情曾如何的坏，我们都没有从08危机所代表的结构性消费文化恶性循环里吸取应有的教训。

的确，直至今日，无论是互联网上的关于消费主义的各种视频，亦或是各种流通于世面的类似《断舍离》这样劝诫消费主义的通俗读物，都没有涉及到消费主义的本质。大多数创作者都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或浪潮，更与个人的自律精神无关。在本质上，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强大变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全新的、扭曲的宗教，通过拜物的形式应许一切的幸福和美好，以维持和压制资本主义内生的矛盾和危机。

正因此，大量作品不谈资本、不谈资本主义而讨论现代消费行为的意涵、流变和解决方案，就不仅是词不达意的、更是不切实际的。关键点，从来不在商品身上，不在消费身上，更不在所谓“消费力所能及的、真正喜欢的事物”身上——毕竟，当你的需求被时刻伪造时、当你的劳动成果都被时刻剥削时、当消费行为被花样百出的资本运作成经济危机时，你又该如何定义“力所能及”、如何定义“真正喜欢”呢？

消费的关键，永远在那个不可言说的背景板，那个无远弗届的资本主义制度身上。一切把消费主义视为消费者的主观个人选择和所谓道德自由，而无视资本主义文化操控之整体性的行为，本身就是其文化操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理智解析这

种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制度性问题、而非明贬暗褒地鼓励维持现状，才是我们走出这个危机纪元的真正道路。

定义消费文化

在二战后，人类掀起了两波主要的经济浪潮，一波是以股份制上市改革和金融革命为代表的资本运作全民化浪潮；一波是以扬弃本土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以广告营销、服务业和文化业等价值链上游产业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浪潮。这两波浪潮，在本质上息息相关、互为表里，构成了资本主义摆脱其在重工业时代和殖民时代致命危机、更加隐蔽地剥削世界的救命符。

英国社会科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曾写了一本名为《消费者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s & Postmodernism)的学术著作，在其中，他指出，关于消费者文化的社会学研究有三个互相关联的、但都可以追溯回马克思的主要流派：

第一个学派认为，消费文化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消费品和购买、消费场所的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文化。这导致休闲和消费活动在当代西方社会日益突出。尽管这些活动被一些人视为导致更大的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但本质上增加了通过意识形态操纵个人自由引导社会人口服从“固有社会关系安排”的能力。

第二个学派认为，从商品中获得的满意度与其在零和博弈中的社会结构性获取有关。在这种博弈中，满意度和地位取决于人们如何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显示和维持地位差异。这里的关注点在于人们使用商品以创造社会联系和维持社会阶级的不同方式。

第三个学派则更接近精神分析学派对消费的情感愉悦的探究，其旨在研究消费者文化意象和特定消费场所所赞颂的梦想和欲望，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直接的身体兴奋和审美愉悦。

换言之，这三个学派分别关心消费主义的三个不同侧面，即资本如何在物质上通过消费控制人民，人类如何通过消费实现阶级差异，以及消费主义如何塑造出愉悦的精神幻梦。而这，也将是我们接下来的三个主要线索。同时，我们要注意，排除这三者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他们都一致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个人消费永远都只是消费文化的冰山一角。我们的个人购买行为永远不可能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与我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而想了解这种身份和文化是被如何塑造出来的，我们就必须回到这三个学派的祖师爷，即马克思那里去。

马克思与消费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之前，人类在长时间内是不具备消费主义的基础能力的。因此，无论在何种文化里，禁欲主义和最小化消费的概念几乎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尽管这种主流并不是在每个时代都被有能力的精英完美地实践。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精英、无论他是儒家的士大夫还是基督教的加尔文主义牧师，会将过度消费作为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面临大规模生产所产生的大规模剩余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坏过去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改变人类对消费和生产的看法。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洞察到的未来世界的格局改变。

正如他所说：

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在另一个人身上创造一种新的需求，以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类似于奴隶的依赖状态，并诱使他相信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快乐，从而慢慢走入经济崩溃。每个人都试图在别人之上建立一种外来的力量，以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利己主义需要的满足。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处于统治阶级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力图在人们身上创造新的“需求”，并试图将传统的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对工作的掌控感和自豪感异化，甚至赋予它们一个资本价值。换言之，统治者们希望把一切需求消费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来源不断地创造新需求、并且重新定义所有需求。而这些行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处于一种“新奴隶状态”，以维持社会的阶级分化。同时，这种消费主义世界观，最终将服务于统治阶级转移人民注意力的目的，阻止他们思考变革的可能性。

在这种系统性的操纵手段中，“异化”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就简单地说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最大的问题不光是经济利益和剩余价值被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自己真正的兴趣被疏远和分离，工作只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创造任何精神成就感和利他主义的正外部性。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

“工人只有在闲暇时才会感觉自己在家里，而在工作时，他会觉得无家可归。他的工作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性的。它不是一种需求的满足，而只是一种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它的异化性质清楚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那就是一旦没有物理上的或其他层面的强迫，劳动就会像是瘟疫一样被避免。工人在其产品中的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和劳动产物成为了一个客体，具有自己的存在，而且意味着它独立地存在于工人之外，对工人来说是陌生的。他所赋予生命的物体成为了一种敌对的外来力量，作为一种自治的力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开始变得疏远和异化。疏远和异化他们不光是在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旨趣——因为，这些传统价值在消费品的价值面前、几乎一文不值。

最后，人们甚至将这种被异化的、与社会其他价值和关系皆疏远开来的生活状态为自豪。人们畏惧关系、恐惧社交，甚至连消费时都要尽力避免与店员的谈话，更讽刺的是，当资本家以这种脱节的社会关系为卖点时，人们甚至甘之如饴。是

的，在这个时代，享受完整的、彻底的、不被打断的被异化的权利，甚至都成为了一种消费品。

至此，商品开始获得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行为”、而人却恰好丧失了这两者。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远不仅仅是工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异化了，因为那些统治阶级的成员也被异化了，他们将永远担心任何形式的变革将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当他们看到火苗时，他们寝食难安。于是，他们便需要更多的、象征着自己的异化状态的军功章，比如一副拥有腹肌的、由高档健身房健身教练和药品打造出来的皮囊，或者斥资千万打造出来却从不踏入、最大的功能就是找个看房网红来拍视频的私人图书馆。换言之，他要告诉全世界，我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可以决定你们的异化状态和模式，是因为我比你们更异化、更扭曲、更付出，甚至仅仅是睡的更少。

进而，异化不再被视作异化，它更被视作一种荣誉、一种规范。而无法承受这种规范和荣誉的人，不仅将被视为失败者、更将寻找不到任何形式的人生意义和社会认可。于是，这种全方位的异化和压迫最终将工人阶级赶入了消费文化，就好像沙漠里寻找清泉的人臣服于海市蜃楼的幻象引沙止渴一般。人们逐渐发现，只有当他们购买东西时，他们才能找到短暂的满足感，才能摆脱困扰他们的异化状态。于是，一个类似毒品的恶性循环被创造了出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作的越多、被异化的就越多。这导致他们必须通过购物和参与消费文化来逃避这种异化的感觉，但这往往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就必须越来越努力地工作、越来越努力地被异化。在当下，这种痛苦不光是个恶性循环，它更像是一个死循环。

然而，如何确保工人能在消费上获得足够多的虚假满足、而不去思考这个系统本身呢？这就要提到广告、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甚至整个泛文化行业为消费资本主义所起到的润滑剂作用了。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广告销售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种普遍参与的、无法被规避也不允许被规避的消费性社会秩序。广告通过产生人们的不满和焦虑来发挥作用，并以弥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感为食。它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消费上来缓和这些感觉。你可以躲避消费，但你无法躲避广告。至此，人们不再关注统治阶级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也不再关注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一切，都只与自己当下的、片面的需求有关。

此外，广告的另一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促进自恋。它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个人需求或欲望上，而忽视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他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忽视那些没有被广告推送的需求。广告切断了人对同阶层人民的团结意愿和同情，它让社会的中低层劳动者永远无法真正联合起来。于是，我们便浑浑噩噩地相互斗争、像被驯养的鬣狗一样互相残杀以渴求主人今天恩赐的饭食。然而，主人们往往还对鬣狗负有感情和义务，而对劳动者而言，他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屠夫。

想要详细分析广告对消费主义的作用，以及广告消费主义是如何为人类营造出永不间断的虚假满足感、最后得以让我们忘记自己被剥削和异化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尊大神，那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精神的、上世纪最重要的后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与广告性拟像世界

让·鲍德里亚是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由于广告在消费文化中的重要性，他所写的《物体系》一书中的最后一部分就致力于分析广告的意义。

他曾这么写道：

任何对客体系统的分析最终必然意味着对客体的话语分析——也就是说，对促销“信息”(包括图像和话语)的分析。广告不仅仅是物体系统的附属物；它不能脱离物体系统，但也不能限于它的适当功能，因为广告的作用从来都不是严格提供信息的。广告整体上造就了一个无用和不必要的宇宙。它是纯粹的、被编织的“意义”。它对生产或对事物的直接实际应用没有任何贡献，但它在物体系统中发挥着不可分割的作用，不仅因为它与消费有关，而且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成为消费的对象。

换言之，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现代社会广告负责促进消费，而在后现代社会，广告本身就是消费的对象。再过去，广告是寄生在消费品的实际作用上的产出物，而在现在，消费品必须依循广告、尤其是由广告的整体系统性（而非单一广告）所营造出来的文化幻象的意志来设计自己。

于是，越来越多的广告，尤其是那些大公司的广告，比如豪华汽车和电子产品，更不必说奢侈品行业，他们的广告通常与产品本身的细节毫无关系，而致力于埋下草蛇灰线的情感线索。

因此，这个社会从“功能”和“实体”，走向了“符号”和“拟像”。也只有符号和拟像，能超脱于现实世界，为资本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对更美好生活的幻象。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广告所诉诸的不是现代性的核心、即理性精神，而恰恰是后现代性的核心、那就是对无限阐释和无限意义生成的反理性精神的商业性构建。换言之，广告所追求的，是完全剥夺工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将其降格为可以由不断被权力所重塑和再定义的话语、阐释和符号所操纵的木偶。

诚如伦敦大学社会学家 David Walsh 所说：

“当代社会是一个后现代社会，它不再是由符合其需要的个人生产所构成，而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交换所构成。因此，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异质性社会，在话语、生活方式、身体、性、交际等层面上都有独特的日常生活规范和实践，它涉及到对主导着现代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及其工具理性的否定。但可悲的是，这种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和独特生活方式都被广泛地符号化和商业化了。现在，资本主义创造出了一个以属性和符号为尊的消费社会。这是一个基于新的技术和文化形式的模拟社会。符号现在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经验的主要决定因素。符号和代码取代了现实，这个世界是通过各种符号的模拟再生来体验的，以至于与符号原本寄生的、本质的真实消失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被创造出来，在这个世界里，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模拟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由符号创建的模型取代了真实。”

然而，消费性文化符号的本质是消费过去确实存在过的文化属性，比如摇滚文化、巴洛克主义、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更传统的艺术创造形式，比如诗歌、绘画、文学等等，它本身并未创造出任何的新兴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时尚界永恒的定律是“复古”，因为“复古”本质上就是对过去的无限抄袭和复制，反映的恰恰是整个广告消费业本质创造力的虚空。

换言之，广告消费主义永远都在不断消耗过去，而没有创造出新的事物。正因此，鲍德里亚提出，广告消费主义最后会消耗掉人类所有现存的文化符号。

但广告消费主义依托于消费资本主义的底层运作逻辑，资本不可能允许它就这么死去，因为它背后背负的甚至不光是几十个百亿级别企业的生死，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得以欺骗人民而存续的龙脉。因此，鲍德里亚提出，一种不反应现实生活意义，只与系统内的符号互动的、符号的符号出现了。他将其称之为，拟像。

在鲍德里亚看来，拟像与符号最大的不同在于，符号仍然致力于模拟某种程度的真实，而由于拟像本身所模拟的就是不真实的符号，它就可以完全逃脱出真实世界的引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纯粹的权力-话语体系。而这种体系，则完全是为资本所服务的，因为它无拘于任何形式的真实。就拿这几年很火的球鞋文化为例来说：

在最开始，球鞋仅仅是球鞋，它的功能性和实体价值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广告，所描绘的也更多是球鞋在面料和工艺上能为实战所带来的帮助。

然而，在球鞋的第二阶段，即 **Air Jordan** 品牌出现之后，**Nike** 开始大规模地和各大球星、球队等文化符号所挂钩，进入一个大营销时代，这个阶段也被大量的商业学术研究列为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典型。至此，球鞋进入符号模拟阶段，消费者对球鞋的购买欲望已经从这鞋好穿好用转移到了这鞋乔丹穿过。然而，即使如此，这时的符号模拟仍然反应了某种层面的文化现实，比如某双鞋见证了某个著名的绝杀、或者被协会禁穿的轶事。因此，它也确实具有某种“真实”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阶段中，就好像所有教堂里的十字架一样，尽管并非本真原初之物，但也反应某种文化现实。

但是，在球鞋文化的第三阶段，即近几年出现的所谓“炒鞋”文化里，各种针对符号、而非符号所模拟的现实的二次模拟、即拟像，也就出现了，那就是所谓的“球鞋系列复刻”和“经典球鞋再设计”。所谓的复刻和再设计球鞋，他们所模拟的对象已经不是当年的某场具体比赛所代表的文化属性，而是球鞋这个物体系统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如果说 **AJ1** 初代禁穿和扣碎的价值来自于那几场赛事，那接下来所有的复刻和再设计鞋款，他们的价值就只来自于禁穿和扣碎这些本身就是符号模拟的鞋子本身。初代球鞋的意义来自于它所模拟的事件，而复刻球鞋的意义却来自于初代球鞋。前者是符号模拟，而后者是纯粹的拟像，因为前者仍受限于基本的真实性，而后者则可以被无限复制。大家自己去看看现在改个色印个图标联名个名就能卖到上万的球鞋就知道什么是拟像了。

至此，广告消费主义找到了解决文化符号短缺的出路。而拟像的生产，由于其完全脱离真实世界本身，便可以无限地根据商业利益被再塑造、再定义。今天可以

流行巴黎的奢侈，明天就可以流行美国的摇滚，今天可以捏造岁月静好，明天就可以鼓吹丧即是真。于是整个大规模生产系统再也不愁缺少可以操纵人心和制造幻梦的各种文化符号。

然而，对鲍德里亚而言，这种拟像消费相比于符号消费而言更次等、更无法真正满足人类的需求，因为他们消费的产品只是“虚假的物品或者幸福的特征标志”，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力量赋予拥有者幸福。至此，空虚、不快乐的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消费更多的产品，希望找到满足感。这便是又一个永无止境的死循环。

于是，在最后，所有的事物都沦为了消费品，而所有的消费品也都丧失了它的原本现实意义，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唯一意义，也便沦为了创造和交易各种各样新兴的文化符号。资本和商品于此刻，终于跳脱出了凡胎肉身，以符号为神、文化为魂，踏上了漫漫的登神长阶——也是从此刻开始，我们要面对的，就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个体或者群体，而是一种超越了单一意识、无远弗届般存在的宗教秩序。

而这，也解释了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何如此难以反抗。因为，我们不是在屠龙——而是要弑神。龙是一个敌人，比如大洋彼岸的某个国家，哪怕它再强大，它的本质也是肉体凡躯。你可以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打败它、消灭它。这没有问题，这可以做到。然而，神是一种秩序、是一种广泛的意志、是一种超越的共谋。它无法在物质上被消灭，它永远可以转世重生。能取代神的，只有新神。一神教秩序曾是一种最强大的神，哪怕你把欧洲所有的教堂烧掉，你也无法浇灭他们的信仰。它无法被消灭，只能被继承，曾经，它的继承者叫国家、叫殖民主义，现在，它的继承者叫消费、叫资本主义。龙是神的宿主，也是它的表象。如果你不能弑神，屠龙者或许只是下一个容器。

作为个人自由、全球文明和阶层政治的消费主义

的确，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街景都可以证明消费文化的宗教性地位。和遍布欧洲各地的教堂一样，今天的商场们在外形和精神上也出奇的相似。没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剥削和控制，赋予了所有国家的产品和消费以世界性的特征。这个世界既不是通过政治信念也不是通过任何其他共识凝结在一起的，统合这个世界的事物，本质上就是消费品和市场利润。因此，与之前所有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的自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购物自由、消费自由。这就是消费主义第一个近乎神性的宗教承诺，那就是个体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对自由的再定义，事实上也是那么多人像狗一样努力工作的原因。现代社会的雇佣制度把人类社会切割成了工作和生活两端。人们忍受着工作的负担，这样他们就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但生活需要由我们拥有的东西来定义。

和宗教的承诺一样，消费主义的力量说服我们，让我们确信可以买到所有我们自己不具备的东西，例如，美貌、名望、朋友，这诱使着我们自愿地被资本主义夺舍肉身、来为它延续生命。

同时，对我们来说，购物、消费和拥有东西是如此“自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或文化属性，就好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不会质疑信仰的必要性一样——他们只会争辩一根针头上能站几个天使，就好像我们争辩口红有多少色号一样。消费和信仰一样，它就是我们的存在、是我们自由的根基。这正是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它最大的力量不光在于它定义了我们是谁，驱使了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少地去提出问题。我们既不思考它是否是一种特权，更不思考它是否是一种镣铐。它仿佛是一个思想上的中立地带或真空领域，但又无远弗届地存在着。

此外，我们很少想知道购买的冲动来自哪里，或者商品是如何生产的。只有当一个最喜欢的品牌从货架上消失时，我们才会想，究竟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导致了它的神秘消失。没错，商品的出现是自然的，我们不会问他为什么出现；而商品的消失反倒是不自然的，它象征着关于我们的一部分定义被抽走了。没错，在我们的生活中，商品不仅是被期待和垂涎的存在，它更是我们的日常社会存在的锚定物。它使得资本主义如此诱人，更使得批判资本主义如此困难，哪怕是在智力层面批判它都仿佛是天方夜谭。

我们被消费迷住了，因为消费对我们来说才是真实的。我们更可能去购物，而不是去阅读、参与讨论，或者是单纯地思考。时至今日，当你和你的朋友出门时，你几乎难以找到一个与消费不挂钩的活动。公共假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那最讽刺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不会思考劳动力的价值，我们只会关心什么东西打折了、打了多少折。

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最大的陷阱就是，当你完成一天沉重的工作时，消费就会像毒品一样催促着你完成最快捷的多巴胺分泌。你的工作越累、越不自由，你就越需要在消费中寻找付款的轻松和选择的自由。也因此，你就越不会思考为什么你要工作的这么辛苦。没错，你需要消费来帮你忘记工作中的辛苦。于是，那些工作中最辛苦的人，反而成为了最不可能改变这个剥削他们的制度的人。当变革太过宏大、太过遥不可及，而透支性享受又近在咫尺时，你永远无法说服、更不具备这个道德高低来说服任何人选择变革、而放弃享受。事实上，这正是他当年未曾设想到的未来，在这个时代里，人人都是工贼——却又不得已成为工贼。由于选择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如此规范化，我们幸福地没有意识到构成我们购物自由基础的社会关系，即与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人和资本家与资本和利润的不平等关系。这，也正是“商品拜物教”的作用和由来。

的确，我们如此执着于商品本身，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正如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把商品具象孤立化，好像它们是有自己生命的东西，好像它们似乎神秘地独立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组织，因此我们可以无思考、无负担地使用它。

此外，消费的诱惑进一步抑制了阶级意识的发展；如果我们都可以去购物中心，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消费？毕竟我们都享有购物的自由，我们都享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商品。因此，错误的意识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自由地同意在劳动力市场上推销自己，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和存在不仅弱于我们自身所创造的事物，更弱于我们所购买的事物——没错，在这个时代，物要远比你重要得多。

因此，我们不得不欺骗自己，如果我们买更多的东西，我们就会更有价值。过去，他曾说，“我们除了枷锁什么都不会失去”。然而，现实情况是，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所说的那样，当你的镣铐待久了之后，你会对跪着这件事情上瘾。因此，消费和消费意识形态将我们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了全球文明的新标志。

于是，这种所谓的“全球文明”为一切的不平等作了最精巧的辩护。现代消费社会不仅有目的地系统地生产产品，而且还有目的地进行差异化。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异缩减为他们所拥有的消费品之间的差异。进而，人和人之间在权力上真正的差距，被缩减为了他们所拥有的消费品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在这个时代，当人们看向资本家时，人们看不到他们手上所掌握的权力，看到的是他们的各种奢侈消费享受。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资本家真正的权力被遮蔽了，这削减了冲突的可能；二、消费层次的差距创造了一种虚假的目标感和自由感，仿佛普通人只要也能消费起这样的东西，你也就获得了和资本家一样的社会阶层和权力地位一样。

换言之，在消费资本主义之下，人和人的差异和差距似乎都可以用购买的商品不同来表征。如果说差异的商品化仅仅是让所有人被虚假的个性所蒙骗，那么差距的商品化就是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不平等的现状，因为他们意识不到一切除了商品之外的、实质的权力差距。只要他们拿起最新款的 iPhone，他们仿佛也成为

了和那些生产出 iPhone 的硅谷精英一样的人。然而，我们都知道，猎物和猎手，是不可能同日而语的。

消费主义的宗教化

没错，当消费主义开始为自己树立自由、个性、文明和平等的圣碑时，它便正式开始接过耶稣的权杖、成为一个新型的宗教。

在鲍德里亚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已经彻底脱离了马克思时代所经历的功能性消费，而走向了彻底的符号消费和拟像消费。人们从消费中所获得的快感已经从重工业时代所标志的各种物理感官享受，走向了更好被资本主义操控、更无穷无尽的伪精神文化享受。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相比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消费主义更危险之处在于，它几乎完全脱离了人类的物质现实，因此可以被无穷无尽地生产和无穷无尽地消费。因此，它是一种更好地缓解工作异化的精神鸦片，也是一种更好的、解决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剩余和行业永动性的工具。诚如鲍德里亚所说，广告管理我们的需求，它教会我们从消费每一件物品中期望得到什么。换句话说，它告诉我们每个物体给我们什么，或者一个物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说，广告不仅仅鼓励我们购买产品。它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将特殊的事物与特殊的社会概念和意义联系起来。

因此，即使广告不能说服我们购买某种特定的产品，它仍然是一个赢家，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迫使我们接受广告语言或对象的意义及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简而言之，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并遵守它赐予我们的规则。今天，“我们不再通过产品本身来消费产品，但是我们通过广告来消费产品的含义”。于是，广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架设在虚空里的宗教，它用一种全新的规则关系教育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关心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社会。在过去，无论任何信仰，天堂都是一道窄门，你只有不断削减自身的外力、还原自己的本质，你才能穿的进去。而现在，天堂似乎是为重度肥胖症患者设计的加护病房，你只有不断地增肥、不断地增肥，让外物充斥你血脉和灵魂的每一寸，你才能走进这个极乐世界。

于是，在这种消费的宗教化下，拥有产品不是主要目标。相反，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消费完成“自我实现”。消费社会通过广告，使自我实现成为了一件切实的操作。你拥有了一件汉服，你就是汉文化最正统的捍卫者。你拥有了一件 *Lolita*，你就是 19 世纪的英国小公主。你拥有了每季最新的电子产品，你就是美国硅谷的极客精英。而且，你的裙子越正、你的电脑越贵，你的自我成就感就越高、纯度就越浓，哪怕你压根没读过四书五经、哪怕你对近代的欧洲历史一窍不通、哪怕你不剪辑视频也不打 3A 大作，只要你消费了，你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个人，而余下的我们，也会鼓掌认同。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的内部冲突或深层倾向在消费过程中被动员和异化，就像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一样”。广告系统创造了一个地位和声望的等级制度，并迫使我们接受它们。每一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在这个系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它可以将一个人定位在一个特殊的权力和地位上。

现在，这个商品可以作为人类特征的指示器，如性格、举止、人性、情感、勇敢等等。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他们生活在一个物体系统中，其他人根据这个系统的规则来评判和对待他们。

于是，通过拥有一张可以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挨着坐的餐桌，我们可以表明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聚在一起吃东西；通过在起居室里放一件乐器，我们可以表明一个人对音乐的热情，即使他不知道如何演奏它，甚至对音乐不感兴趣。

情感、忠诚和人性本来是必须在现实中进行表达的概念关系和生活经历；但在现代物体系统中，这些概念通常是通过商品来表达的。

诚如本杰明·巴伯所说，消费主义成为了一种新颖的身份政治，在这种身份政治中，企业自身扮演着打造有利于买卖的身份的角色。身份在这里成为“生活方式”的反映，这种生活方式与商业品牌及其标签的产品，以及与我们在哪里购物、如何购物、吃什么、穿什么等与消费相关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这些属性反过来又与收入、阶级和其他经济力量相关联，这些力量看似允许选择，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超出了个体消费者的控制范围。品牌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深层身份认同上的表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成为替代身份认同、并获得个性的形式。它们取代了传统的种族和文化特征，压倒了我们为自己选择的身份认同的自愿方面。

至此，消费便彻底宗教化了。

在这种普世的宗教下，我们相信消费社会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需要做的仿佛只是更加努力就好了。于是，即使一个人生活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即使他从这个社会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也从不怀疑或批评消费者社会的系统，因为他或她相信这个系统是完美无缺的。如果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不是系统的问题，而是你个人的问题，因为有足够的产品和服务供每个人使用。消费社会是为每个人的财富和幸福而建立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得到它们，那是你的问题：你应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观念是个人处于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制度得以生存的主要原因。

消费的意识形态试图为我们创造这样一种信念：创造性地劳动以获得意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生活在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史无前例的，仿佛一切都准备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和欲望。

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一切都依赖于消费的社会。我们所有的需求和需求，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物上的，都必须通过消费社会所规定的那种消费来满足。此外，所有通往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都已经在消费社会中定义和确定。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们。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因为他们只需要等待着通过购买好运和幸福的标志来获得好运和幸福——在这个时代，救赎似乎触手可得。

仿佛天堂近在咫尺，仿佛你我皆是信徒。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世界吗？

AI 弑神：消费主义的破局之道，人类最危险的时代

的确，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接近走到了最危险的境地。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警告，但社会大众似乎完全无视了它的教训。哪怕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消费主义的真相，理解了消费主义是资本为了剥削人民，并让人对工作异化和生产剥削无感的一种手段，他们似乎也无法走出消费主义的陷阱，更无法说服他人加入他们。

靠民众的自我意识反抗消费意识形态的操纵是一条出路，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高压的资本社会工作制度之下，在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并明知自己无法在未来逃脱出这种境地的绝望之后，你真的能选择不投入消费主义的怀抱吗？依赖民众的意识觉醒固然是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太不稳定，不稳定到只要有一点甜头，就会出现无数的反叛者和工贼。这注定将是一个脆弱的联盟。然而，如果消费者无法达成联盟——那么生产者是否可以呢？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回到了更宏观的经济史和人类学视角上。这次，我们发现了新的东西。

在现代资本社会之前，消费和生产并不是分开的事物，它的核心、也是它们的平衡点，是交换。为什么前现代社会不存在消费主义，因为消费主义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对生产的抽离。而在前现代社会里，每一个物品都是被相对单一、相对能见、相对个体化的生产出来的。你消费的不光是一个物品，你还能相对感知这个物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同时，当你自己销售你的生产物时，你也能被消费者所感知到。这种互相感知，最终成为了彼此对对方价值的承认，也保证了交换的天平两端不会失衡。此时，消费的意义从消费这件孤立的行为，转化为了对对方生产价值的认可。这与黑格尔-科耶夫的“承认理论”也是暗合的。

然而，当全球资本化击穿了具有能见度的本体交换模式，并用全球化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消费品时，个人是意识不到消费品背后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属性的。甚至连购买一件商品的过程，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尽量地“非人化”，比如店员不要找你说说话、快递员把东西放门口就好。于是，当我们在消费一个产品时，我们不会花心思去思考它是怎么被“人类”制作出来的，中间有多少辛苦、努力、巧思和剥削。我们只需要使用它就好了。这种效应被当代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集体失忆症。而这种失忆症在劳动过程被普遍机械化之后就愈发强烈了，因为真正的人类离切实的生产过程越来越远了，每个人都成为了螺丝钉，没有人是真正的一件产品的生产者。

也正因此，相对应的，在全球资本和工业的劳动和工作过程中，我们也往往预设，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哪怕具有尊重和认可，这份情感也不会转嫁到我的身上，而会加之在已经被拟人化、甚至被宗教神像化的“消费品”和“公司”身上，或者某些资本家身上。而我，也再也无法在生产中找到价值依归。

同时，由于扭曲的工作制度和生产制度，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被剥削的时间、精力和劳动所得完全落入资本家的掌握之中。人们越来越辛苦，消费地就越来越多。最后，工作不光成为不了归属，反而成为了瘟疫。

换言之，正因资本主义供应和生产网络的发达、正因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以及商品和符号拜物教的神化，人类再也无法从“生产”、“工作”和“劳动”这件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了人性本质的事物获得实体价值和精神价值。也正因此，交换的天平两端被打破了，消费成为了唯一的、让我们获得价值依归的事物。我们从“生产决定了我们的身份”，走向了“消费决定了我们的身份”。

这种消费资本主义会带来一个主要结果和两个伴生结果。其主要结果是：因为消费成为了价值依归，也因为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极其痛苦且异化，人类会逐渐遗忘生产的价值，进而认为生产对于自己的价值实现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干什么职业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赚钱、能通过消费“止痛”就行。进而，人类会开始丧失自己的工作能力，以至于完全放弃生产的个人性，完全投入消费。

这个主要结果将带来两个极其可怕的伴生结果：

1、由于人类抽离于商品生产，商品中的“人性”，也就是那些反应生产者个人特质、经历和情感的事物会逐渐降低，最后走向最彻底的沃尔玛化和麦当劳化。而这种无人性的造物，又将在以消费为主的世界中被捧上神坛，最终，整个社会将慢慢滑向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和拟像的深渊，成为真实性的荒漠。

2、由于工作者对于“生产”的重视逐渐降低，资本家将加快机械化和 AI 化的进程。换言之，当所有人都只看中自己消费者的身份，并以此逃避资本主义在生产端的异化时，资本家就会彻底抛弃人类劳动力。同时，由于工作者对生产的关注度下降，他将离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生产技术和资料越来越远。最后，当资本主义决定全面机械化和 AI 化时，底层劳动者将在任何维度上都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技术。注意，是任何维度上。至于有几个维度，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也因此，想要解决消费问题，以及消费问题所带来的生产问题，我们就不能只靠呼吁民众意识觉醒来解决消费问题，而是更要通过更复杂的途径来解决生产的异化问题。我们需要让人类在工业体系和泛金融化世界秩序下，获得对工作生产更多的掌控权，让人类更少地在工作中被异化、更少地被剥削。只要生产不被异化和剥削、工人可以掌权，只要人类在生产中能获得更多的精神和物质价值，消费的价值自然就会被降低，而我们也能拥有更多有灵魂的、有情感的劳动结晶。而消费和生产也将从对立回归统一，回归到其作为“交换”的天平两端。

而这个过程，就更加地复杂，因为这涉及到人类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工作制度该如何被改善的问题。它不光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有关，更与经济学甚至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相关。AI 究竟是会帮助资本家彻底消灭整个劳动力阶级、以实现消费主义的利润最大化，还是会赋能普通工人、让人能够跳脱繁琐的螺丝钉劳动，以机器所不能及的人性光辉发挥出独特价值，这不光是一个科技问题，而将是人类在本世纪所将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AI 也许不会自己成神、消灭所有人类，但

只要我们在人文、社科、科学、工程，以及广泛的社会合作和制度安排上犯一个最小的错误，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是 AI 成为消灭普通人类的最好工具。

当消费主义消灭了生产的意义、并将生产交托于 AI 之手时，它必侵蚀了人类最基础的人性，剥夺了人类所有的创造力，剥削了人类所有的劳动成果。

人类，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能杀死神的只有新神，屠龙战争只不过是外在的表象。而新神往往吞噬着旧神的尸体而生。欧洲现代国家得以建立、殖民主义得以伸张，与基督教的世界格局和宗教精神紧密相关，但它在成功后，几乎彻底消灭了宗教在政治中的话语权；消费资本主义得以成型，则与现代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息息相关，但它最后成为了跨越国境、一统人类的凶兽。哪怕是它最忠诚的信徒美利坚，也会被他的贪婪残忍吞食。那么，寄托于消费资本主义而生的 AI，是否又会彻底消灭其父神的格局呢？而这种格局的破碎，究竟是重生、还是毁灭？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这场弑神的战争，没有人可以逃脱。

是选择劳动 AI 化和资本全球化下的真实的荒漠，还是选择人人都能在生产和消费两端获得更大自由和快乐的新世界——未来的命运仍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想要的未来需要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才能得到，为此，我们必须学贯文理、不问中西。而我们不想要的未来，其实只需要我们一直堕落和愚昧下去就可以了。怎么选，看你自己。

日月奇谈

《让子弹飞》

——一部革命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

听婵释禅

姜文先生以一个思想家的深厚思想底蕴，用一部仅有 130 分钟的梦幻式电影表现形式，通过“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再重新周期轮回到封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循环演变过程演绎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由此，所引发的连篇累牍、异议纷呈的解读也让人目不暇接。仅乌有之乡这样的一般艺术作品都瞧不上眼的顶尖思想平台，也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发表了 60

多篇解读和观后感等的影评文章。由此可见，这部史诗般的恢弘巨制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的巨大影响。虽然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生活经历、阶级立场、认知认识和理解感悟事物的能力等去对《让子弹飞》这部作品进行属于自己的解读和感悟，但真正能够被姜文先生纳为“知己”的解读也许并不会很多。

在这诸多的影评解读文章中，其中虽不乏“神来之悟、精道之感、洋溢之颂、惜惋之叹”，然而听婵释禅还是觉得影片中的许多“思想之深厚底蕴和艺术之灵光精巧”，还没有进行过更深层次的挖掘禅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没有登上艺术赏析的峰顶。为了让这朵集“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惊世骇俗之奇葩，真正地开在人们的心中，并在实践中结出“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伟大硕果，听婵释禅试图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上来解读和感悟这篇必将不朽于世的恢弘巨制，与大家站在更高的基点上共赏析。

一、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开头与结尾”所暗喻的宏大命题

《让子弹飞》的开头和结尾，正好暗喻暗合了那个“革命由成功到失败”的“周而复始周期循环规律性”在世界大地上的重演和轮回。影片开头，那些代表“传统封建车马行担生产力水平、封建分配制度、封建文化”等的拉动火车飞跑的“马匹”，与代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资本主义文化”等的那列“火车”孽合，所结构形成的那个“由马拉的火车”这两股动力所拉动的“封建资本主义或是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怪胎”。

在影片的开头，暗喻的是“张麻子等革命者”打出了向“封建资本主义”攻击的第一枪，并喊出了“让子弹飞一会”的总是需要穿越时空的期待和等待的意味深长话语。这“第一枪”和后来的许多枪，许多观众都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空枪，而影片所说的“没打中”，是看到了在“马并火车”速度大致相同的暂短时间里，现实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而“等子弹飞了一会”，不久人们就戏剧性地看到了那些“马匹”渐渐地脱离了与火车连接的“缰绳”而分崩离析了。这弹无虚发的“子弹”，首先打断、斩断或是解体的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结的“官商勾结”的“缰绳”的组织架构形式，也即“推翻或是分崩离析了象征“车马行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那个封建社会”，或是“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让代表“封建社会制度”的那些“马们”分崩离析，如云霄般地消散，彻底失去其社会存在的现实意义。然后，再将代表资本主义的“那列火车”通过“血与火”的革命方式彻底地进行颠覆、推翻。而那个彻底“颠覆”并支离破碎的火车，正是对“推翻资本主义”的象征。

影片仅用几分钟梦幻般的“蒙太奇”艺术表现手法，就把影片的“要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平正义社会迈进”的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封建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理念的“代言人或是化身”的“真马邦德和他的老婆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还要继续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的阻碍和误导作用。

而整个电影的中间段落，都是在表达一个“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的“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血与火”的历史演变过程。因为“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就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思想理念，如果说一个社会没有了这种

核心价值思想理念，不管其有多少民主、自由等的价值理念，那这个社会肯定不再是“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平社会”了。

而到了电影的结尾，革命队伍中发生了走什么“道路”的分歧。没有人再愿意跟着代表“马列毛革命者的张麻子”继续革命了，没有人愿意继续“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式的公平“分钱”了，也即没有人愿意跟着社会主义者们继续进行“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式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式地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了。那几个在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幸存，并从衣着打扮上可以看出分别是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等的曾经的革命者，“依然”坐上“那列”除了后面绑上一辆代表生产力水平已有所进步的“自行车”（比如：中国八十年代初之象征）之外，其他都是原封不动的“马拉的火车”，向着影片开头火车奔跑的相反的方向跑回去了，准备去做可能的另一些“黄四郎们”去了。也即这些跟着革命领袖曾经革命的弟兄们，又重新登上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物——“封建资本主义”的“物是人非”的“马拉的火车”，重新走上和走进了历史的周期循环的老路和轮回，并开向了代表“封建资本主义”最繁荣发达的那个地方。而代表“马列毛革命者或是社会主义左派”的那个“孤独的张麻子”，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回归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孤独求索”之中了。

影片的开头与结尾，即紧扣了主题和形成了前后鲜明的强烈“照应”，又展现了人类历史循环周期规律性“轮回”的残酷无情。而且即使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也是难以抗拒其巨大的周期轮回规律性的强烈作用。

一部小小的电影作品，能够反映出人类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根本追求要义，并展现出人类历史发展周期规律性重演轮回的如此宏大的命题，如果不是一位匠心独运的思想艺术家，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种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之至高境界的。影片即展现了“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的继续革命之艰难曲折，也表现了“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历史周期循环规律性发挥作用的残酷无情，更演示了的历史文明进步的螺旋式发展的这个哲学命题。影片结尾留给人们许多耐人寻味和残酷无情的思考、难题和谜团，都是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索的代表未来人类社会命运发展的宏大课题。

二、“康城”和“鹅城”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暗喻、指代和象征“张麻子，也即马列毛革命者们”，在影片开头的推翻了“封建资本主义”象征的“马拉的火车”以后，本来是要直接去“康城”地走进“意识流”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城”在影片中象征的是人类追求的“共产主义”（communism--康城）的理想社会。但要能够去了“康城，也即共产主义”，就必须垮过“鹅城”，也即社会主义”这道坎。因为当时的人类社会还是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为主导和统领地位的“分配关系”。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也还没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即“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地丰富”。因此，首先还要“建立社会主义”，还要革命性地调整“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的“分配关系”，并确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和统领地位。而在苏俄就曾经开启了这种“分配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而影片中用“俄式建筑”等来作象征和借代，更具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关系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个“鹅城”也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的烽火战场的。去了“鹅城”，而没有去

“康城”，这种“阴差阳错”看似偶然，然而这又是革命历史发展规律性和发展阶段论之必然。

三、只有通过把“印把子”、“劫富济贫”、“驱出达虏”、“枪杆子”、“造反有理”等的力量集合起来，摧毁和消灭“反革命组织体、剥消制度象征的碉楼和外部列强，以及黄四郎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统治阶级领袖之罪魁祸首”，革命才能成功影片用长达 120 分钟所表达的正是通过运用“印把子”，侠义志士的“劫富济贫”、发挥“枪杆子出政权”的作用，开展“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解放宣传运动，和摧毁“反革命组织体、制度象征的碉楼和黄四郎这种精神和肉体（真假黄四郎）的统治阶级领袖之罪魁祸首”等方式进行的革命斗争过程。而影片也是通过这样的五个基本层次和逻辑关系展开了“张麻子等革命者”的那艰难曲折、艰难困苦和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演进过程，并最终取得建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一个层次，张麻子等革命者通过尝试“印把子”也即“法制道德”等进行治国安邦。并把那个象征“法制道德”或是“印把子”，并已“雪藏”很久的“申冤鼓”搬了出来，然而经过几个回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革命者不仅完全败北，而且还搭进去许多革命者（老六）的性命。这就说明在“剥消压迫掠夺卖国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没有彻底推翻的情况下，单纯地走“印把子”的“和平演变”和“法制道德”之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层次，张麻子等革命者又尝试通过古代“侠客仁人义士”的“劫富济贫”、“杀富济贫”的方式去播撒和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然而这条道也仍然走不通。张麻子等革命者通过“劫富”播撒和“济贫”给劳苦大众的社会财富——“银子”，由于尚有“剥消压迫掠夺的分配制度”的存在；由于还有剥削阶级的利益代言“黄四郎”这个首领的存在；还有“碉楼”这个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权益武装机器”的存在；由于还有外来反动势力“假张麻子利益集团”的武装干涉和插手捣乱破坏，那由张麻子等革命者“分发布施”给劳苦大众的社会财富——“银子”，又通过那些象征剥削阶级“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财富剥削收刮掠夺机器——那“几辆货式马车”等方式，又全部被剥削阶级收刮掠夺回去了。也就是说，剥消压迫掠夺的分配制度不变革，掌握剥削压迫掠夺“武装机器”的黄四郎和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碉楼”和外来干涉并助纣为虐的“假张麻子们”不打倒，播撒和寻求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还是不会生根发芽，革命的胜利还将是短暂的。

第三个层次，张麻子等革命者改变了斗争策略。他们先与黄四郎们联合，先把武装干涉并助纣为虐的“假张麻子们”消灭干净。而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反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在内的所有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硝烟烽火，难道不正是这种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之战吗！尽管革命者在这种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利益斗争中付出了更大的牺牲，但却换来了进行国内革命、追求“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四个层次，革命者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通过对失败经验的总结，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并积极武装人民地“撒枪”。然而在革命者将象征武

装斗争的“枪支弹药”发给民众后，并未出现“一呼百应”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民众还都在等待观望。于是三番五次地“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枪碉楼”的“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解放宣传运动就展开了，而此时影片再一强化“主题”地喊出了“让子弹飞一会”的等待民众的觉醒和觉悟。这就说明，革命不仅要给民众“枪杆子”，而且还要让民众成为自觉自愿地使用“枪杆子”地跟着革命领袖和革命队伍干革命的英勇战士。而这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启蒙宣传运动，也只有唤起人民的觉醒和觉悟，才能为革命奠定根本的自觉自愿的思想理念基础。

第五个层次，也是革命者最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也即上面那些革命条件在不断地成熟之后，如果不将象征剥削阶级“精神领袖”的“假黄四郎”消灭，并把人们的恐惧心理彻底驱除，那还是没人愿跟着干革命的，而只能是仍然的等待和观望。而一旦张麻子将那个统治人们思想的精神领袖“假黄四郎”彻底消灭了，人民就会势如破竹、势不可挡地跟着革命领袖和革命队伍干革命了，而那个被“印把子”、“劫富济贫”、“驱除达虏”、“枪杆子”、“造反有理”等硝烟烽火大革命运动已经摧残的千疮百孔并象征“封建资本主义”碉楼的“纲举目张”的“大门”，也就没有任何可以阻挡革命洪流冲击的阻力和障碍了。而那个代表剥削统治阶级领袖的“纸老虎式肉体的黄四郎和实体的碉楼”的从根本上解决掉，也就不再用再费吹灰之力了。

影片正是按照这样的线索、情节、层次和逻辑关系展开并发展演进的。影片不仅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逻辑关系合理，而且还情节曲折叠荡、思想内涵丰富蕴藏、细微之处表达深远且意味深长。而张麻子等革命者这种“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这种历史演进过程，就浓缩在这短短的 120 分钟里了。影片不仅给人们留下了可歌可泣、激昂振奋，而且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味、思考、反思和苦痛。这就是这个令千百万人感慨万千、感同身受、感恩戴德、惋叹不已，并“仿佛就在昨天”的革命史诗般的恢弘巨制。

四、“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诠释了只有消灭“剥削阶级这个精神和物质领袖的你”，才有“无产阶级的我”的存在和生存可能

《让子弹飞》的结尾部分有一段重要对话，黄四郎问张麻子：“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张麻子的回答是：“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答案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革命道理就是：只有打倒代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黄四郎这个象征剥削阶级精神和物质领袖的你”，才是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并走上“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当家做主人的命门。而让“伟大的革命领袖”不断地“接班”领导人民继续革命，也才是保住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关键之关键。那些“光着上身”象征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才能真正永远地享受到“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阳光雨露，才能真正具有永远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衣服”。

当我们透过剧情这些“繁枝细节”去透析其所反映的“本质或是真理”时，你就不会感到那仅仅是在叙述一个简单并荒诞的故事，而是在展现着那些由“刀枪蘸着血泪”挥洒出的一幅幅革命理想主义的英雄画卷，一部饱含激情、震撼世界的关于“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史诗。而影片中

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风骨，也就时隐时现地显现出来了。

五、“细节”，所有的“细节”都赋予并承载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蕴含、暗喻、比喻、象征和表达表现，并使之全部能够“说话”，由此也把影片的艺术性推到了空前的高度

由于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必须要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左右表达完整其想表达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因此就不能象电视剧那样悠闲自地任情漫谈了，其必须要经过对整个制作过程包括每个细节的精雕细刻。而姜文的《让子弹飞》又是表达了这样一个宏大的“革命历史演变过程”的重大题材。因此，影片不仅整个故事演进的情节和层次选择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重点重大事件，以便充分地表现《让子弹飞》这个故事的主题，而且所有的“细节”也都给赋予的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的生命语言、思想内涵和暗喻、比喻、象征、表达表现的话语权力。正是这些不可或缺的“细节”话外音，才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表达的思想内容。这无论从衣着、道具、场景、音乐，还是语言、情节、顺序、逻辑等方面的“细节”上，都蕴含丰富地表达并丰富着影片的那同一个宏大主题。

这无论从衣着上那“光着上身”象征无产者的打扮，还是张牧之手下那几个“工农商学兵”等并已经是“干部”，并随时有可能成为“黄四郎第二”的弟兄的“装扮”；无论是那些“三教九流”百姓的穿戴，还是那个可以让“黄四郎的肉身有九种死法”的“摘挑子”政客的“假洋鬼子”的不伦不类“扮相”；无论是用枪在大门上打出的并对得不到民众响应而感叹的“！”，还是那对革命彷徨和未来的疑问的“？”；无论是结尾火车上挂着的代表生产力有所进步的“自行车”，还是那个同样是被封建剥削压迫的“黛玉晴雯子”名字的对《红楼梦》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借代；无论是那几场深藏压抑怨愤寻求爆裂渲泄时机的激烈“鼓声”，还是扮成侠客做布施“公平正义”的好事仍需要偷偷摸摸地用“筒”的脸帘来遮挡；无论是反动派明目张胆地施展“阴谋”，还是树上的屁股兜里的那五张委任状；无论是依附在地主资本家身上的“官僚”在与地主资本家共谋获利后的“三七开”，还是张麻子、马邦德和黄四郎的“三真三假”中所演变出来机巧百变的“阳谋和阴谋”，等等，都承载了影片需要表达和表现的生命语言，并用这种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的“标签”，辅助整个故事情节的顺利展开，并彰显着不同角色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丰厚的思想内涵和播放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画外音。也正是这些蕴含丰富的“细节”，才使整个故事的情节、场景、层次等更加丰满成熟并富有艺术生命活力。

总之，《让子弹飞》这部优秀电影作品，不仅是一部融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且必将不朽于世的恢弘经典巨制，而且也是一本浓缩并再现了二十世纪曾经席卷世界的那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演变过程的通俗读物；不仅是一部革命者追求“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用“血与火”书写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而且也是一部歌颂伟大的革命领袖领导人民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百折不挠、铸就辉煌的生动历史教科书；不仅是见证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并

由社会主义的“鹅城”向共产主义“康城”理想社会“追求”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摆在人类面前并急需解答和破解的“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循环怪圈”的重大现实课题。而“姜文”这个名字，也会与他的这部恢弘巨制一样，必将载入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的无上荣耀的思想艺术史册之中。

我们要做持久战来扩大理想主义者的队伍

——《让子弹飞》观后感

这是比喻，比喻，比喻，比喻你懂不？这是电影里的原话！这也就是电影的全部，如果你看了这电影，你肯定听到了发哥的这句来自内心的话，他要的不是告诉他的下人，他在告诉观众，这是比喻，这电影是比喻。它在比喻什么呢？比喻中国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历史。短短的 100 多分钟的时间，它真实的讲述了中国的近代史。不是吗？

电影给我们讲了什么？电影告诉了我们：

一，理想主义者的不易为官，特别是人下之官——他说因为我只会站着——不是吗？

二，文革红卫兵的真实，强奸民女的不是麻匪是黄狼的人，即做坏的不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是敌对分子。电影把文革给简单化了，简单了也就轻易的讲明了历史的本质。

三，理想主义者发动百姓的不易，不让下跪——最终还是跪了，不是吗？今天有几个百姓没跪？发银子——百姓拿而复退！发枪——敢怒而不敢为，受吓于假老虎的虎威！不是吗？最后终于发动了百姓，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成功之后的结果是什么？1，百姓觉醒了么？远没有！不是吗？拿了钱能退回去，分了东西就不会退回去么？只要理想主义者不在，退回去是必然的。今天的人民财富与权利还在人民之手么？2，革命时的理想主义者的同盟军还能跟随理想而前进么？没有灵魂的人是随时会变节的，特别是外部环境松懈的时候，不是吗？电影中的人说，以前的生活不轻松，他们要去浦东了——这是什么？这是他强奸完了，你强奸的历史，不是吗？一般的人都喜欢不劳而获，都讨厌不轻松，都讨厌奋斗，不是吗？3，理想主义者的孤独结局，这是历史的宿命——因为理想主义者太少了，不是吗？直到今天，理想主义者都是少数者中的少数，不是吗？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事就必须发动人民，而历史又无情的告诉你发动起了人民，不是觉醒了人民；发动人民不易，但觉醒人民更难，简直难于上青天——不是吗？试看历史的今天，何时人民真正觉醒起来过！！！！有胆造反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不是吗？能造反之人最多者为黄四狼之流或普通麻匪兄弟，不是吗？本质上黄四狼和麻匪兄弟有区别么？——没有，如果说区别有的话，那就是所处的条件不同罢了，但他们绝对是一种人。理想主义者得靠谁？靠理想主义者么？试看当今天下之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有几人，这几人能成气候么？单靠理想主义者是明显不行的，靠人民么？人民是谁赢他们帮谁，能有戏么？就理想主义者们别说出出现赢的局面，哪怕是麻匪们赢的假象也造就不了——这是肯定的，所以理想主义者直接和人民接轨是不可能的了，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和处于麻匪地位的黄四狼先结盟，这也是无数历史的选择，不是吗？这一选择也就注定了毛泽东的悲哀，当革命成功后，并肩战斗的黄四狼们必定要求做黄四狼，而你毛泽东如何选择？要么就随他们，自己退后，希望他们日后见面还能打个招呼，自己做个孤独的智者；要么利用自己的威信，偏开黄四狼们，直接和已经发动起来的人民结合。这前一个要么就是电影的结局，这后一个要么就是文革的历史！！不是吗？

四，好人和坏人讲理，不能一根筋。一根筋的老六被玩死了，没有一根筋的张兄对老汤不守信，但对老黄守信，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很好！张兄的选择

就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好人的选择---我们不能一根筋。我们不但不能一根筋，还要有像老张那样把不是的照片硬说成是的功夫。这是坏人的常用手法，不是吗？不是交通事故硬说是交通事故，不是 77 的房租硬说是 77。我今天要说这手法不是坏人专属，一切有利于战斗的方法，我们都要借用，包括这手。

五，电影在比喻了历史的全部之后，也向所有理想主义者发出了一个问题：理想主义者的出路在哪里？张兄选择了迷惘，他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姜兄给了我们答案---我认为是---骂醒人民，教育人民，让人民真正的开启窍来。当然这一点姜兄也还只是在摸索当中，但他至少给我们摆明了问题，并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这是电影的最大成果。

一切理想主义者们:我们要的不是革命，但也不拒绝革命，主要是骂醒人民，教育人民，用一切之手段，做持久战的准备，为了心中之理想，世代奋斗，直至理想主义者遍天下。

写着玩的

理自 459584-3152626835

那一天，**李世民**竟然意外地通宵了一整夜。左右无趣，还趁黎明登上楼台，迎面温风，随即**提了提裤腰带**。他眺望东方，见有四分之一轮红日正好在地平线正中绽放耀眼光芒，而众星未因太阳消沉，星河错落，好不美哉。

他忽然想起古书上写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大喜，心中舒畅。

正在这时，苍穹正中突然飞来大火球直击世民。世民大惊，突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实在是异梦也，不知寓意什么。连连回味琢磨，他把此事暗暗记住，决定明天早朝后叫住**李淳罡**，问他此梦暗示着什么。夜色尚早，他还可以休息会儿。他挠了挠被汗浸湿的睡袍，正待休息，神回识明。他发现腿上有斜乱散放着几部精致的书，装订奇妙：有一层保护的透明薄纸将书包裹覆盖，无缝隙，保护书不受潮湿损害；全书又用布包裹，朴实无华，但纸张洁白，十分金贵；封面又有异字，大体可认得是本国字，应该是异体字的一种……

世民本就好奇，又被惊吓得睡不着觉。他也是喜欢书的人，见猎心喜，又有这奇怪的事奇怪的物件，他当然不会错过。他撕开表面透明的纸，不禁感叹不愧是仙家的东西，这仙家读的东西还真是金贵，还用这么精致的东西包裹。他小心叠好，放到一旁。他先翻开什么“**资本**”的一书观瞧，虽然有许多字不认得，文章行文文句古怪、粗鄙不堪，但还好有好多字可辨，大体文句有规律可循，这一来二去连蒙带猜，倒让他读懂了七七八八。读到性急，他还会忍不住大骂：“资本家真他娘的不是个好东西。”

雄鸡报晓，天蒙蒙亮，恍惚中他看完了这几部书，觉得这本书的作者真是大才，隐约将历朝历代兴亡之由说出了几分，实在是厉害。伸个懒腰，舒缓僵硬疲惫的身体。他看向窗外天色蒙蒙，正欲准备老早就想的小憩，转而又看向另一部书，什么“**宣言**”……

翌日一早，宦官三报上朝。破天荒，勤奋的皇帝今天竟然没来上早朝。**魏徵**摩拳擦掌，找到今天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又可以为一生致力的**杠精事业**而奋斗了，真好。**房玄龄**在一旁拉着，不让他去找皇帝，**免得大家都不自在**。这时皇帝却叫宦官把他们连同一些人一起叫去，这让房玄龄疑惑，让魏徵开心。

刚一进门，纳头便拜，房玄龄刚要三呼万岁。李世民突然走近，扶起为首的房玄龄：

“咱们都是为革命献身的同志，你这么客气干嘛。”

“皇上？”

“要叫同志。皇上是专制主义头子的称呼，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他**。所以你要叫我同志。”

“同志？”

“对，小同志，你的思想道德水平进步的还是的很快嘛。”

“同志们。”李世民说：“我昨天得到了一本好书，让我明白了许多。有了这本书，我相信我们大唐王朝，不！是我们**大唐人民共和国**，一定能**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干碎他娘的反动势力**。所以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每个人都要读这本书，读完这本书之后每个人都要交给我八万字的学习报告。”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们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而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打倒欺压奴役人民的人！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势力这三座大山。我们争取要将这三座大山从人民的头顶上推下去，这个时候，就是时候该让名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大唐这片土地上降临了。”

“上行下效，从我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是可行的！

